



中华环保联合会
All-China Environment Federation



气候慈善伙伴 行动规划 2030

二零二五年十月

环境资助者网络 (CEGA)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 14 区青年沟东路华表大厦六层

电话：010-51266665

邮箱：zhangruiying@acef.com.cn

版次：202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2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CEGA

开篇题词



王秀峰

第四届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会主席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各个国家都在加强应对气候危机，中国也在持续围绕“双碳”目标构建系统的政策体系。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公益慈善、社会组织的力量也十分重要，因此《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应运而生。该研究报告旨在有效引导中国民间气候慈善的行业发展，有效衔接政府、企业及相关社会服务机构等各方的行动，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并在国际气候治理框架中有效对外讲好中国气候故事。

在国家制定“十五五”规划的时间节点，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秉承中华环保联合会“大中华、大环保、大联合”的工作理念，联合包括CEGA成员在内的气候及生态环境类基金会，NGO在内的气候慈善伙伴，共同描绘今后五年共同的愿景和行动目标，鼓励社会组织敢于担当，主动作为，聚拢气候慈善伙伴的智慧和影响力，打造我国首个基于本土民间的气候慈善行动纲领，为“十五五”规划贡献一份民间力量。

《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0 和 2025 中华环保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进行国际国内发布，期待大家关注！

王秀峰

导语



孙桢

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原一级巡视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9月22日，《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2030》完成初稿并进入修改完善阶段。

回顾这项工作的初心发起，是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认识到改革开放的新要求，看到国家气候行动提速升级、社会组织参与愿望强烈，看到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出现逆动、外援资金减少，还看到国内慈善活动越来越向战略性和影响力方向发展，在与CEGA伙伴讨论中形成了开展某种“综合”工作的想法，并进一步明确为伙伴行动规划。

工作团队对这个创新性想法虽有短暂的自我怀疑，但经过思考和讨论，特别是听取了伙伴各方的正向反馈，反而更坚定了。这可能是所有的创新活动都会经历的过程。所幸的是，在中华环保联合会支持和大家共同努力下，《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2030》即将可以呈现给气候慈善行动伙伴和社会上更广泛的受众，也将有机会通过COP30走向世界，毕竟相当比例的气候慈善资金将会惠及“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项目活动。

希望读者在面对这个作品的时候，可以把她当作一个伙伴，一个可以提供帮助的同时自己也在成长的伙伴，理解她的善意，包容她的不足，也增添您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成就保护地球气候的行动，共同成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梦想。

孙桢

寄语

CEGA 联席主席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谢晓慧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姚瑶

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力量助力国家低碳绿色发展目标和全球气候治理，CEGA 成员伙伴共同发起“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 (CPPI, Climate Philanthropy Partnership Initiative)。该项目旨在动员更多上游慈善资源和社会力量进入气候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探索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及生态环境慈善系统，以支撑社会力量协同行动，扩大影响力。

作为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十五五”蓝图规划开启之际，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大家呈上这份《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报告。

该报告旨在擘画今后五年（2026-2030）社会力量在气候及生态环境领域的行动纲领和实施策略，凝聚民间力量以有效衔接政府、企业及上游资助者等相关各方的策略行动，为国内国际气候及生态环境治理贡献民间力量。我们采取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方法相结合，聚拢气候慈善伙伴和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精心撰写出这份报告。我们这里所说的“气候慈善”是气候及生态环境慈善的简称；我们所说的气候慈善伙伴，是包括 CEGA 成员伙伴在内的一群愿意运用慈善力量为国家及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的机构伙伴。报告承载着我们这群人的思考，力量与担当。这是一次忐忑而又大胆的尝试，报告并不完美，但我们希望报告可以给大家以启发，思考我们共同的未来，以共同的行动实现美丽中国的宏愿！

我们将在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0 和 CEGA 年度论坛发布《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报告，并将呈送给国内外慈善家，企业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供决策参考。

感谢 CEGA 成员伙伴们！感谢气候慈善伙伴们！在一起，了不起！

CEGA 气候 慈善 伙伴 计划 项目 启动 会

寄语



杨彪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
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指导委员会联席主席

“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是所有CEGA成员伙伴2024年共同发起的，我非常荣幸受大家的信任和委托，与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谢晓慧共同担任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指导委员会联席主席。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简称“SEE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多维度策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一直推动联合更多的力量支持气候行动。

气候慈善伙伴计划将着力培育气候及生态环境慈善社群，促进更多慈善家、企业家、企业、基金会、NGO了解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强化资助者对于气候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捐赠作为战略慈善的价值和影响力的认知，从而让更多慈善资金汇聚到气候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同时促进相关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机构能力提升。《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2030》报告是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的核心工作，也是引领气候慈善伙伴今后5年行动方向以及上游慈善资金如何高效使用，充分发挥慈善影响力的纲领性文件。希望大家可以在“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总原则下，找准本机构的生态位，制定项目战略和行动方案，发挥第三部门作用助力国家绿色低碳发展。

非常感谢指导委员会各位委员对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以及《气候慈善伙伴规划2030》编写工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杨彪

推荐语



王谋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政府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

《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一五年之约：我们正站在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节点。气候变化不再是遥远的预警，而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紧迫现实。未来五年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窗口期。“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份行动路线图与集体承诺。它超越了单个组织的零散努力，旨在凝聚中国慈善领域的智慧与资源，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这份规划不仅关注减缓排放，更深入适应韧性、公正转型、生态保护等核心议题，力求系统性地应对挑战。希望慈善家们、企业家们成为“气候慈善伙伴”和我们一起，以战略为舵，以慈善为帆，共同驶向一个气候安全、公正且繁荣的未来。



安亚强

老牛基金会秘书长

作为一个气候慈善领域的实践者，我认为《规划 2030》不仅是一份战略蓝图，更是指导我们工作的“思维导图”。报告提出的“五大战略目标”和“八大重点议题”，为行业提供了清晰的工作框架和行动指南。我也特别赞赏报告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创新实验室”定位，气候慈善本身就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与尝试，需要志业者勇于开拓与创新。



侯远青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秘书长

报告结合国内气候及生态环境领域社会组织工作现状，战略性地提出下一个五年（2026-2030）行动规划，应该重点支持的领域，开展创新实践和示范的方向，如绿碳蓝碳抵消机制探索建立，气候变化适应等。对引导慈善资金资源走向，主流化意识提升等有重要意义。发挥国内公益机构的优势，开展新的创新实践。



王利民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聚拢更多的伙伴和CEGA一起加入应对气候危机的伟大行动中来，《规划2030》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们这样怀揣初心和使命的一群人，在这样第一个民间气候慈善行动规划引领下，正确辨别行动方向和途径、快速匹配好影响力项目、扩大资源、跨界合作，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王振刚

中华环保基金会副秘书长

非常好的报告！重点议题基本实现领域全覆盖，示范项目计划促进成员伙伴独立行动，体系建设反应了集体的思考。面对主要议题既有形势的分析，也有问题的剖析，还有展望和建议；报告编制很专业，构思也很好，点赞！通读下来，我感觉报告能提升气候慈善工作在伙伴圈里的重要度，提上更加重要的议程和安排，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独行快，众行远，确实需要联合更多的慈善伙伴开展气候工作。



傅昌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慈善总会家风传承与慈善信托委员会总干事

很高兴看到《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2030》新鲜出炉。中国政府在减碳、防止全球暖化、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确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也树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国际形象。这些重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相关领域商业主体及各类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的参与和努力。建议相关企业决策者及慈善界同仁们认真看看《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2030》，给自己或所在机构加入气候慈善行动找到准确的切入点。同时也希望这个行动规划对第三部门助力国家“十五五”绿色发展真正起到指引和促进作用！

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 指导委员会名单

CEGA 内部委员：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1. 安亚强 老牛基金会秘书长
2. 侯远青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秘书长
3. 王利民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4. 谢玉红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5. 谢晓慧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指导委员会联席主席、CEGA 联席主席
6. 闫保华 红树林基金会（MCF）秘书长
7. 姚 瑶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CEGA 联席主席
8. 杨 彪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指导委员会联席主席

外部专家委员：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1. 傅昌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慈善总会家风传承与慈善信托委员会总干事
2. 孙 楷 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原一级巡视员、CEGA 顾问
3. 王 谋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府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

报告编写主要参与人员

组织策划：

张瑞英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执行主任

主要执笔人：

乔 峰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气候慈善顾问

沈一帆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环境慈善研究专员

核心工作团队：

倪 壴 中华环保联合会战略合作部部长

张瑞英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执行主任

乔 峰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气候慈善顾问

沈一帆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环境慈善研究专员

龙冬荃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环境慈善研究伙伴

王 霞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项目官员

伍靖枫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

刘 熙 万科公益基金会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高级项目经理

黄莹欣 千禾社区基金会原项目官员

影响力示范项目计划 提交机构

(排名不分先后)

老牛基金会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

红树林基金会（MCF）

万科公益基金会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中国海洋保护基金会

自然之友基金会

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业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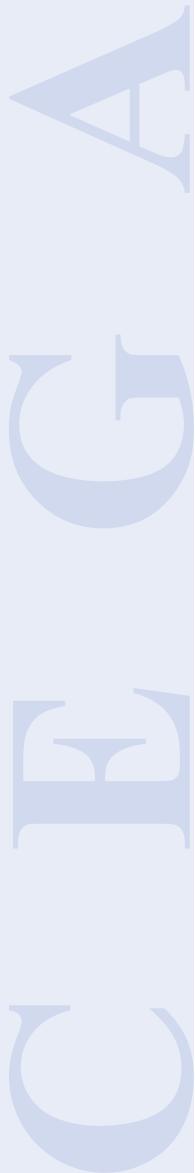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目录

执行摘要	1
第 1 章 发展战略与资金需求.....	5
1.1 发展战略分析.....	5
1.1.1 形势分析	5
1.1.2 战略定位	6
1.1.3 战略目标	6
1.2 资金需求分析	9
1.2.1 资金现状及需求预测	9
1.2.2 资金来源及筹资体系建设	11
第 2 章 重点议题展望	14
2.1 温室气体减排	14
2.1.1 发展现状	14
2.1.2 主要挑战	15
2.1.3 2030 展望与建议	16
2.2 气候变化适应	17
2.2.1 发展现状	17
2.2.2 主要挑战	19
2.2.3 2030 展望与建议	19
2.3 减污降碳协同	20
2.3.1 发展现状	20
2.3.2 主要挑战	21
2.3.3 2030 展望与建议	22
2.4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协同	22
2.4.1 发展现状	22
2.4.2 主要挑战	23
2.4.3 2030 展望与建议	23
2.5 公众宣传倡导	24
2.5.1 发展现状	24
2.5.2 主要挑战	25
2.5.3 2030 展望与建议	26
2.6 绿色低碳企业推动	26



2.6.1 发展现状	27
2.6.2 主要挑战	27
2.6.3 2030 展望与建议	28
2.7 行业基础建设	29
2.7.1 发展现状	29
2.7.2 主要挑战	30
2.7.3 2030 展望与建议	30
2.8 国际交流与合作	31
2.8.1 发展现状	31
2.8.2 主要挑战	32
2.8.3 2030 展望与建议	33
第3章 影响力示范项目计划	34
3.1 温室气体减排	34
3.2 气候适应与公正转型	35
3.3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	36
3.4 减污降碳协同	38
3.5 公众宣传	39
3.6 绿色企业推动	41
3.7 行业基础建设	42
3.8 国际合作	43
结语	45
附录一：报告评阅专家名单	46
附录二：受访专家名单	47
附录三：参与气候慈善伙伴招募及调研的机构名单	48
附录四：机构介绍	50

执行摘要

全球气候变化正加速演进，应对气候危机刻不容缓。过去十年，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治理和污染防治方面经历了历史性、转折性及全局性的重大变革，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面向未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与气候治理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政策窗口持续打开。同时，企业绿色转型和国际化发展需求激增，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也空前提高。这既给环境慈善公益行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对我们的行动模式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气候慈善领域（包括气候变化、生态保护修复及污染治理领域）的社会组织如何面向未来，更加系统性地提升能力、整合资源，真正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在迎接历史性机遇的同时，如何有效应对监管环境趋严、经济形势不确定性高、公益筹资难度加大等现实挑战？我们又该如何摆脱行业规模小、专业能力欠缺、资源分散以及影响力难以衡量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成员机构共同发起“气候慈善伙伴计划”（Climate Philanthropy Partnership Initiative）¹。作为该计划的核心工作之一，制定《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以下简称《规划 2030》）旨在为中国环境慈善公益行业谋划未来五年（2026-2030 年）的发展蓝图，凝聚民间共识，明确行动路径，力图为环境慈善公益组织在制定战略、设计项目、筹资与能力建设、支持气候行动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推动社会力量从“项目执行”向“系统变革推动”的跃升。《规划 2030》突出向资助方传递我国民间公益与政府、企业绿色转型需求的对接价值，推进行业内社会组织从项目执行向系统变革为导向的转型，让有限的慈善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气候治理的作用。“找准定位，看准方向，行动规划，备好粮草”是本报告的初心和目的所在，也是报告编制的基本逻辑思路。

本报告的编制是在 CEGA 决策委员会和“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指导委员会的统筹引领下，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历时数月，凝聚多方智慧而成。工作团队首先面向核心环保社会组织发放并回收了结构化问卷，覆盖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 58 家组织，系统梳理了各机构在气候议题上的战略定位、项目布局、资源瓶颈与发展预期。同时，团队深度访谈了 34 位专家和行业实践者，就中国气候慈善发展趋势以及具体议题进行战略研判和展望。这其中包括 20 位 CEGA 成员单位秘书长及一线项目主管，以及 14 位来自政策研究、国际发展、企业 ESG、传播倡导等领域的资深行动者。在桌面研究环节，工作团队广泛梳理国内外气候慈善政策文件、行业报告和最佳实践案例。最终在整合问卷数据、访谈洞见与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本报告。

¹ 2024 年 8 月，CEGA 成员伙伴共同发起“气候慈善伙伴计划”项目 (Climate Philanthropy Partnership Initiative)。该项目旨在动员更多上游慈善资源和社会力量进入气候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共同支持有重大影响力的气候行动项目，并探索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及生态环境慈善系统，发挥社会力量助力国家 3060 双碳目标的实现。

《规划 2030》力图从“一手托两家”的视角，一方面为上游资助方（慈善家 / 企业等）提供优先资助领域引领，另一方面为气候及生态环境领域社会组织制定今后 5 年的项目战略与行动计划提供分析和展望。

本报告重点分析研究“发展战略与资金需求”“重点议题展望”“影响力示范项目计划”等关键内容。

在“发展战略与资金需求”章节，本报告系统分析了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当前的战略机遇与外部挑战，指出面对我国气候、生态、环保政策的快速升级迭代、企业社会责任与 ESG 需求的提升、以及公众参与方式演进、国际合作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我国环境公益行业进入了承前启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转型期。面向 2030，本报告提出了“解决方案创新实验室”“公众行为转变助推器”及“跨议题协作推动者”等三个行业发展定位。

2030 行业发展战略定位建议



解决方案创新实验室

在社区零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气候变化适应等前沿领域率先开展试点



公众行为转变助推器

将“双碳”目标、气候变化适应、多样性保护等宏观目标等转化为公众易参与、易感知的日常实践。



跨议题协作推动者

打破环境议题边界，主动与乡村振兴、公共卫生、应急救灾等社会发展领域议题交叉融合，搭建跨领域协作网络。

在此基础上，本报告围绕资金、组织人才、协作网络、国际参与、项目影响力等方向提出了 5 大战略目标：

- 拓展面向地方政府和企业需求的服务，构建可持续筹资体系；
- 建立稳定和中长期支持机制，大力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
- 加大议题间、机构间横向交流，增强合作平台的支持力量；
-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 培育孵化一批“影响力示范项目”，发挥行业示范引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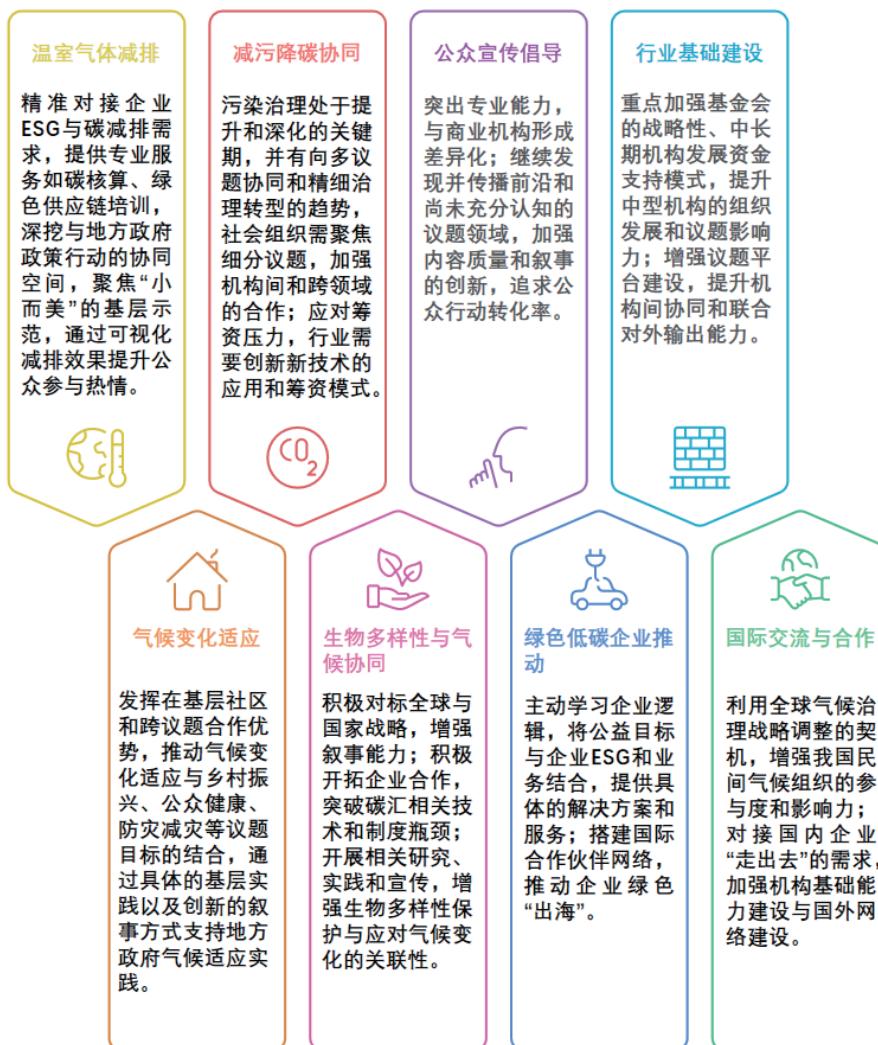
在资金需求部分，本报告以 2024 年气候及生态环境公益领域 15 亿元慈善资金总额为基准（基于基金会中心网往年数据推断），对 2025-2030 资金需求进行情景分析，分别是基线情景、温和增长（年增 5%）和积极增长（年增 10%）情景。资金总需求分别为 75 亿元、91.37 亿元和 110.81 亿元。报告认为若慈善资金量保持目前水平不变，未来行动资金缺口将大幅加剧。

同时在筹资体系建设方面，报告提出五个主要发力点：

- 进一步开展实施气候慈善伙伴计划，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及生态环境慈善系统。支持领域内平台性机构发展和资助者之间的协调机制。
- 强化互联网筹资平台，进一步深化与公众关联的线上筹资模式。
- 推动政策扶持与激励，促进相关政府部门完善法律和财政支持体系。
- 开展能力建设与话语融合，提升公益组织自身能力。
- 探索跨界合作与创新融资，鼓励领域内相关机构应用社会创新工具。

在“重点议题展望”章节，本报告将气候慈善领域分为温室气体减排、气候变化适应、减污降碳协同、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协同、公众宣传倡导、绿色低碳企业推动、行业基础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八大议题，分别剖析现状并提出愿景与建议。各议题逐一剖析现状和痛点，提出了“大题小做”“议题融合”“专业深耕”“共创共赢”等不同的2030发展路径建议。

8个重点议题的2030发展路径建议



在“影响力示范项目计划”章节，本报告收集遴选了相关机构未来五年计划开展的旗舰示范项目。这些示范项目在行动模式、融资机制和跨界协作上富有创新，并已成为相关机构未来计划持续投入精力和资源推动的持续性项目，希望为行业机构提供借鉴，树立行业标杆。

本报告并不试图为行业提出一份封闭的规划文本，而是一份开放的行动邀请。我们衷心希望它能被广大伙伴组织视为一份实用的“路线图”、“工具箱”，甚至是灵感来源，为大家在制定各自2030战略、设计项目以及筹资与能力建设方面发挥参考价值。我们更希望它能成为凝聚行业共识、激发跨界对话、促成协同行动的催化剂，为行业打破孤岛形成合力，共享资源、共担风险、共创模式提供思路。

我们深知，本报告的编制时间紧迫，且由于气候慈善所涉议题广泛、内容丰富，远非短期可以研究透彻。加之行业相关数据基础比较薄弱，许多关键指标缺乏权威统计，研究团队在量化分析及预测推演等方面力不能逮。同时，受执笔团队能力所限，本报告难免存在疏漏偏颇之处。我们诚挚欢迎来自政府、企业、学界和同行机构的批评与指正，期待在未来实践中不断迭代与改正。

第1章 发展战略与资金需求

1.1 发展战略分析

1.1.1 形势分析

“十四五”期间，我国在碳减排、污染物防控、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性进展和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超过 35 个百分点²。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迅速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和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大气污染治理方面，重点城市大气污染物 PM2.5 浓度累计下降 57%，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水污染治理方面，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87.9%，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系统治理初见成效。生态系统修复方面，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24.02%，自然保护地体系覆盖国土 18%³。“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深入贯彻实践。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文明制度与政策体系，正由被动转为主动，从末端治理转为源头防控、从单一修复转为系统治理，正为全球贡献兼具广度与深度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方案”。

在此背景下，我国气候及环境公益领域也快速发展，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已逐步从危机响应、项目执行的角色，演变为服务基层、探索前沿、填补空白、激发创新的重要协同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以其灵活性、专业性和群众性，充分连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公众等利益相关方，在动员社区参与、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推动企业绿色行动、政策倡导、跨界协作、国际交流等多方面亮点突出。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气候慈善行动、发挥应有作用带来了挑战。挑战的核心驱动力源于四个结构性变化：

政府政策升级迭代：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等方面面临更高要求和日益复杂的基层治理挑战，亟需社会组织提供地方实践、创新试点、公众动员与跨界合作能力；同时，中国政府在气候及生态环保领域的“南南合作”和国际交流合作中越来越需要民间社会组织协助与支持。

企业需求更加务实：随着国内外市场对我龙头企业和产品绿色合规要求提升、供应链碳足迹追溯趋于制度化、绿色金融标准趋严，企业通过提供慈善捐赠和公益组织合作以实现自身碳减排目标、ESG 等社会责任已经企业“出海”的相关需求增长迅速，同时作为慈善资金的提供者，企业将更加追求与自身业务的关联度和公共关系（PR）绩效，项目偏好向“短平快”倾斜。

公众关注和偏好调整：公众的环保意识虽普遍提升，但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降低了部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 年度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4 年 11 月

3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2023 年 7 月 17 日）

分公众对污染问题的关注。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然偏于宏大叙事，难以和个体行为影响联系起来，行为转化率低、参与的持续性偏弱。提升公众对气候及生态环境议题的认知，社会组织应将解决方案的逻辑简化，构建公众“易感知、可参与、有反馈”的闭环体验，提升传播转化效率。

国际气候慈善资金趋势变化：近几年国际气候慈善资金总体呈增长态势，但资助重点仍然聚焦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行业领域，与大多数国内环保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社区和基层场景差别较大。部分资金受到国际关系及国内监管的影响，进入渠道收窄、流程加长、不确定性增加。

1.1.2 战略定位

气候慈善伙伴未来五年（2026-2030）应当在党建引领下，坚守公益初心、聚焦行业前沿、善于跨界联合、敢于试点突破、积极有所作为。气候慈善伙伴应当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战略体系，以“美丽中国”建设、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双碳目标等核心议程为引领，形成在地方试点、政策落地、公众教育、新技术应用等领域的特色和亮点，成为政府和企业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协作伙伴与创新引擎。

面向2030年，我国环境公益行业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战略转型期。气候慈善伙伴应确立以下三大战略定位：

解决方案创新实验室。在试点不足、尚未形成标准化解决方案的前沿领域，如社区零碳转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气候公正转型、气候变化适应、塑料和海洋污染等领域，率先开展小规模、多场景的试点项目，开发政策工具、商业模式与技术路径。

公众行为转变助推器。将双碳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韧性等抽象目标，转化为公众易参与、可感知、有获益的日常体验与实践，构建绿色行为的激励与反馈闭环。例如依托碳普惠等平台将公众日常行为转化为公益资源，例如联合艺术家、KOL、纪录片团队，以故事化传播将绿色生态的理念转化为生活化和时尚酷炫的体验。

跨议题协作推动者。打破环境议题的边界，拓展跨议题协作的想象与行动空间。主动与气候防减灾、性别平等、乡村振兴、企业出海、青年发展等领域建立“议题共生”关系，通过交叉创新撬动多元资源。

1.1.3 战略目标

基于上述定位，气候慈善伙伴需围绕资金生态、组织人才培养、协作网络、国际交流与合作、示范影响力等五个重点体系制定发展目标：

（一）构建可持续的筹资体系

面对新形势，机构应当突破单纯慈善捐赠的筹资模式，应当在秉持公益理念的同时，积极回应政府、企业和公众对相关服务的需求，创新发展企业/政府/慈善合作伙伴关系（PPP）。例如与大中型龙头企业建立深度的CSR和ESG公益合作关系，推动项目开发与企业品牌价值共创；支持企业“出海”，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全球发展环境；

以碳减排量和碳汇量为标的的企业参与机制，实现捐赠与碳中和目标的联动。同时讲好“气候故事”和“生态故事”，设计具象化、情感化的项目，挖掘公众小额捐赠潜力。

实施路径举例

- **区域专项基金共建**：在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等国家战略区域，联合地方政府、在地龙头企业、公募基金会，设立“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专项基金”，将环境目标与区域经济、供应链责任深度绑定。
- **公益金融工具创新**：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发ESG主题公益信托、绿色影响力债券、碳中和挂钩捐赠产品等，使公益投入具备可量化、可追踪、可回报的金融属性，吸引长期资本。
- **公众小额捐赠深耕**：依托腾讯公益、阿里公益等数字化平台，设计更加具象化、情感化、游戏化的参与产品，构建“议题教育—便捷捐赠—成果反馈—复捐激励”的闭环，提升公众黏性与信任度。

（二）提升组织和人才队伍能力

当前我国气候慈善的头部组织与领袖培育已初见成效，行业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保公益组织和领军人物，推动了议题倡导和政策对话。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显现，部分平台开始搭建工具包、案例库、项目评估框架等基础资源。部分议题协作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在气候行动、减塑、海洋保护等领域的促进信息共享与联合行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然而，气候慈善行业长期面临机构和人才短板仍然明显，包括专业人才紧缺、中小组织基础能力不足、项目效率不高、筹款能力弱等老问题依旧突出。特别是当前气候慈善资源分配存在失衡的问题，资金明显集中于头部机构，“老小树”组织成长滞后。而且当前行业的资金以项目资助为主，“核心支持（Core Funding）”方式提供的资助少。这些都是限制组织发展与人才队伍成长的重要因素。

未来5年，行业应强化中长期稳定的机构培养机制，同时加强基层执行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特别是在项目管理能力、对企业、政府、公众的沟通能力、合规与法务能力、筹款与资源整合能力提升，构建符合新时期要求的行业基本功；支持成立行业联盟，建立自律与协作机制，完善行业伦理准则、项目标准、人才培训体系。

实施路径举例

- 针对中小机构设立“组织成长基金”，提供3-5年核心支持（即运营支持+管理顾问陪伴）；推出“基础能力包”，持续开展财务合规、项目管理、传播策略等模块的能力建设。
- 针对成长期组织提供战略扶持，包括与商业咨询机构合作，协助制定战略规划与资源拓展路径；建立“同行学习圈”，按议题或区域分组，促进经验互鉴与联合行动。
- 设立“核心支持资助联盟”，大力宣传核心支持的益处，扩大核心支持捐赠规模，支持和鼓励慈善组织开展公益资金保值增值活动，在此基础上，由有影响力的基金会、投资者牵头，承诺将一定比例的年度资助转为核心支持资金；开发核心支持资助实践指南和成效评估工

具，组织开展好资助型气候慈善行动。

(三) 建立跨领域协作网络

打破行业内部资源分散、信息阻隔的问题，建立常态化的横向议题交流、协调网络与资源共享平台。支持相关网络和平台的组织发展和模式创新，推动常态化信息资源共享、经验交流、联合行动和影响力共创实践。通过平台化运作，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减少重复劳动和行业运行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深化行业协同与政策倡导，营造有利于创新与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议成立相关工作组，定期发布联合报告、协调行动、共同发声。

实施路径举例

- 建立“气候+”创新议题开发模式，联合公共卫生、乡村振兴、性别平等、减灾防灾、青年发展等议题领域组织，联合开展相关研究并设计开发交叉议题项目。
- 与高校等智库机构共建“气候政策智库”，提升行业研究与倡导能力和影响力，形成多个高效协同、活跃和有影响力的能力议题联盟，并在联盟运营机制、筹资、活动影响力方面取得突破。
- 联合媒体、KOL、艺术家，用纪录片、游戏等形式，将减塑、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韧性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可体验、易理解、可社交分享的话题故事，提升公众专注度和参与度。

(四)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推动中国经验更好贡献于全球解决方案，将国内成熟经验转化为易输出、能落地的受援国落地方案，服务全球南方国家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升我国在气候、海洋、塑料、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及企业“走出去”需求，积极开发有针对性的项目并提供相应服务。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海洋公约、塑料公约等国际气候环境治理框架下会议，输出“中国故事”和解决方案，争取国际话语权。推动类似“国际红树林中心”等由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主导的国际合作平台的运作。针对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意识和能力短板，大力开展相关能力建设培训，将跨文化沟通、国际法务与合规、海外资助与项目管理纳入培训系统，提升行业国际视野与专业能力。

实施路径举例

- 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复制推广红树林修复、荒漠化防治等成熟模式，与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绑定，提供“ESG合规+社区融入+生态修复”一体化服务。
- 在东南亚电网覆盖不足、能源安全脆弱的岛屿地区，利用中国分布式光伏和储能技术优势，联合当地机构，开发适合当地社区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 气候领域“COP同行”，鼓励国内公益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发起“一带一路青年气候行动营”，每年培训100名南方国家环保公益伙伴。推动“国际红树林中心”等由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主导的国际合作平台的运作。

(五) 打造“影响力示范项目”

从行业价值重塑、筹资模式创新、政策倡导能力提升与国际话语权构建等多个维度，构建“可复制、可推广、可测量、可政策转化”的行业标杆性“影响力示范项目”。影响力示范项目具有以下特点：

行业价值明显。破除气候公益项目周期长、成效隐性、难以清晰定义成效的困局，影响力示范项目应通过设定清晰目标、科学评估体系与可视化成果，将抽象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可汇报的成果。

政策撬动功能突出。通过在地实践创新和可行性验证，为政府大规模推广提供样板，推动示范项目成果写入地方或相关部委“十五五”规划政策文件。

跨界资源整合。利用行业“联合共创、多方出资、专业协同”的优势，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社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资源聚合与风险共担。

具体实施内容详见第三章。

1.2 资金需求分析

1.2.1 资金现状及需求预测

当前，气候慈善所涉及的气候与生态环境行业，其公益慈善资金投入规模较小，且尚未形成完善的气候慈善筹资体系，筹资渠道和规模都很有限；民间气候力量在机构数量与资金规模方面仍显薄弱，发展潜力亟待释放。2022年与2023年连续两年在气候及生态环境类项目上年支出不低于30万元的基金会共计126家⁴。2024年《中国慈善家榜》中环境类大额捐赠仅占总额7.5%，2016-2020年环保类公益捐赠中仅14%用于应对气候相关的项目。

基于基金会中心网往年数据推断，2024年中国气候及生态环境行业公益资金支出约为15亿元⁵。本报告以此为起点，测算2025-2030年间气候慈善领域所需的资金情况：

基线情况（BAU）：若不考虑经济发展增速和通货膨胀，以行业目前平均年捐赠额作为基线情况进行预测，呈现稳定平台期。2025-2030年总需求75亿元。

低增长情景（温和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的核定，中国目前经济增速为5%。如气候慈善领域资金需求按照中国整体经济增速一致的年增长5%测算，则到2030年气候慈善领域资金年度资金需求为20.10亿元，2025~2030年资金总需求91.37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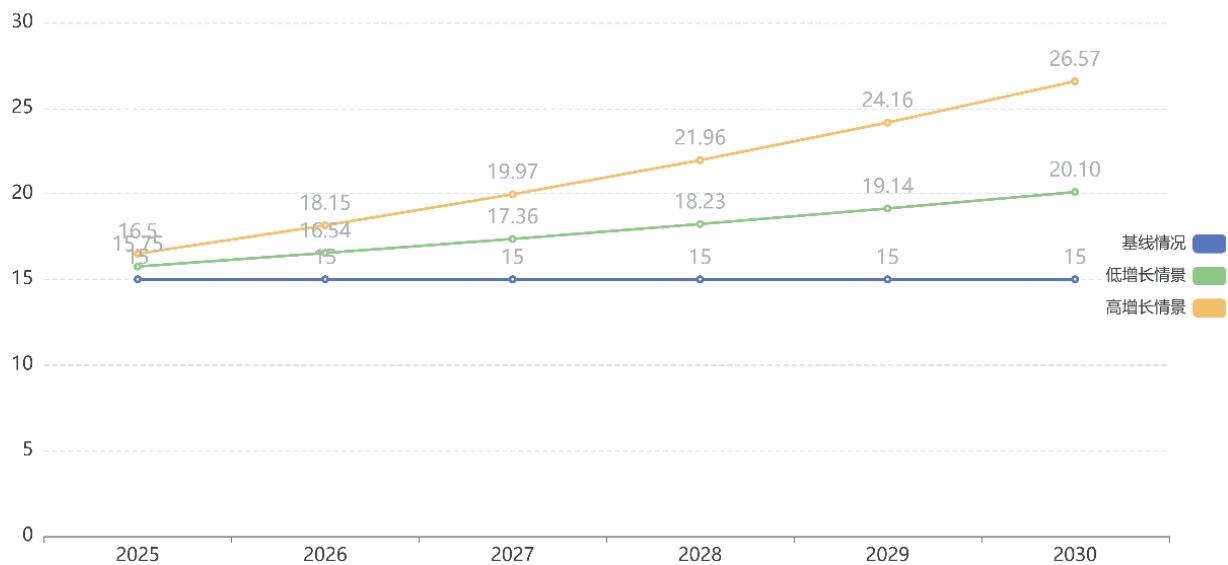
高增长情景（快速增长）：考虑气候慈善领域为新兴领域，而当前全球新兴经济体增量普遍在每年10%以上，因此如领域内资金需求按照10%的年增速测算，则气候慈善领域2030年年度资金需求上升至26.57亿元，2025-2030年资金总需求为110.81亿元；

⁴ 基金会中心网. (2025). 《环境类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FTI2024”表现如何？》https://mp.weixin.qq.com/s/k1xL_NgZ7wK1-65HILzldg

⁵ 2024年，国家能源集团基金会产生了50亿元的大额环境资助，属于特殊情况，因此不含在此次统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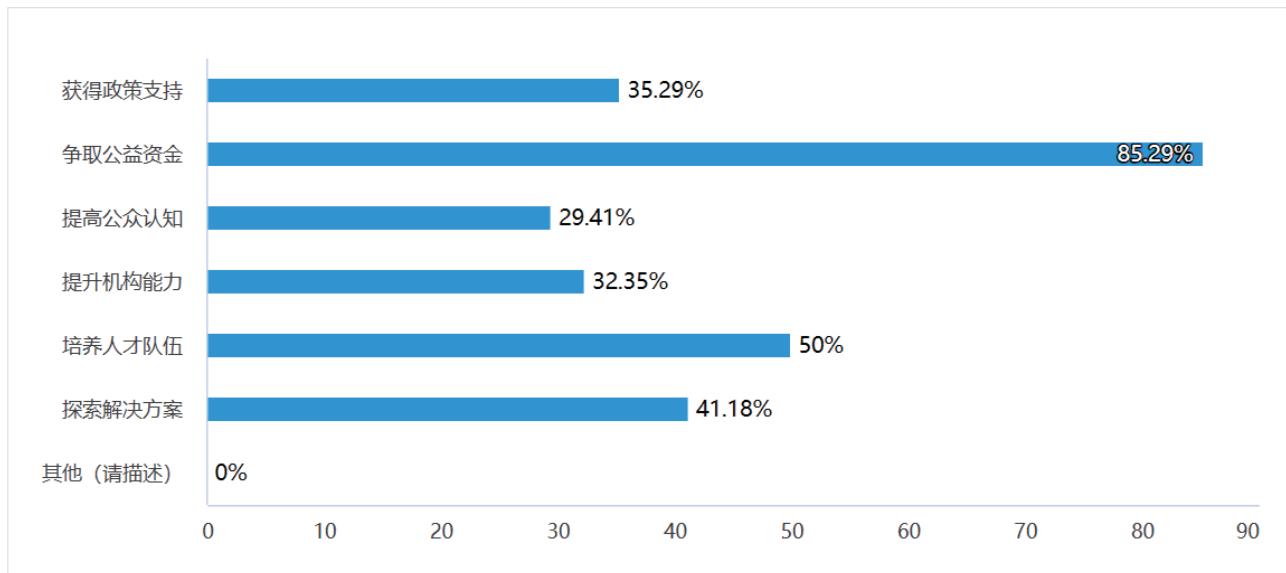
2025-2030年气候慈善资金需求情景预测

(亿元)



分析显示，高增长率的情境下，2025-2030年总资金需求约为基线情景的两倍；即，若按目前行业捐赠额不变的情况下，未来五年的缺口将大幅放大，亟待多方携手探索解决方案。

此外，通过项目对于领域内机构的问卷调查显示，当前气候慈善领域内机构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资金不足（85.29%），其次是人才短缺（50%）。资金不足导致工作人员薪资待遇相对较低，进而导致专业人才队伍培育不足、人员流动率大，在项目设计与执行层面因而无法满足更高的多样化、有效性、可持续性等要求。



受调研机构认为在气候及生态环境领域发展需要加强之处

受制于上述的资金和人才困境，气候慈善社会组织在推进气候工作时普遍感到困难，尤

其是地方气候行动中常见“启动慢、协调难”等挑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前气候社会组织尚缺乏一份自上而下的纲领性政策文件、法律法规或保障体系，导致民间开展的气候项目较为分散，发展路径不明确；多数社会组织的气候工作是基于资助方的要求在项目层面开展活动，整体规划性与协同性不足。以下是调研时收集到的目前领域内机构的主要工作方向：



气候及生态环境领域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方向词云图

1.2.2 资金来源及筹资体系建设

气候慈善资金来源应多元化。传统上，中国公益资金来源包括企事业单位捐赠、社会组织募集、个人捐赠和国际资助等。《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统计 2012-2020 年间，企业捐赠在社会捐赠中的平均占比超过 2/3。气候慈善领域也呈现同样的趋势，资金结构多元但主要来源于企业：据统计，2021 年至 2023 年之间 CEGA 成员所获得的大额捐赠有 71% 来自于企业捐赠，13% 来自互联网平台，10% 是国内外基金会的二次捐赠。大额捐赠主要集中在几家头部基金会，例如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老牛基金会等等；而其他运作型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主要依赖上述大型资助型基金会的二次捐赠以及政府购买服务。

- 高增长率情景：聚焦大型资助和政府资金。主要来源包括企业 CSR 基金（如大型国企和民企碳中和项目捐赠）、国内资助型基金会（如环保公益基金会捐赠）、政府引导基金（中央或地方绿色发展专项基金）、国际基金会拨款等。公众小额捐赠和互联网众筹占比较小。例如假设分布为企业 CSR 30%、国内基金会 25%、政府资金 20%、国际基金会 10%，公众捐赠 / 网络筹款等合计 15%。此时国内来源占绝大多数（90% 以上），国际基金较少。
- 低增长率情景：兼顾企业及民间捐赠。资金来源较为平衡，可包括企业 CSR 20%，国内基金会 15%，政府资金 15%，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碳金融项目）20%，公众捐赠 / 互联网募款合计 20%，国际基金会 10%。此时绿色金融和社会捐赠的比重有所提升，以激

发更广泛参与。

- 基线情景：偏重基层和创新渠道。假设企业 CSR 10%，国内基金会 10%，政府资金 15%，绿色金融工具 10%，公众 / 网络筹款合计 50%，国际基金会 5%。该方案下，公众捐赠和网络众筹占比较高，以普通公众和小额捐款为主；大型资金来源减少。

对气候慈善领域而言，可重点争取以下几类资金来源：一是企业和企业慈善基金会，通过鼓励碳中和示范项目、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吸引企业社会责任捐赠；二是民间公益基金会与家庭慈善，动员已有的环境保护基金会和气候基金关注专项议题；三是政府配套资金与匹配基金，例如中央或地方可设立绿色发展专项基金，与民间捐赠形成配套投入；四是国际及跨国基金，积极争取国际组织和国外基金会（如绿色气候基金、亚洲开发银行气候项目融资等）对中国项目的支持；五是公众与社群筹资，利用网络众筹、社会募捐活动和社区互助基金等小额捐赠形式汇聚社会力量。

筹资战略上，需要结合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需求，创新融资模式和募资渠道。一方面，应持续扩大合作规模，构建公私慈善合作（Public-Private-Philanthropy Partnership, PPPP）平台，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与政府共同出资设立气候项目基金。国际上，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GAEA 行动”已提出通过公私慈善伙伴关系每年释放 3 万亿美元气候资金的目标，国内可借鉴类似模式，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策激励：完善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所得税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赠气候项目。统计显示，在现有税收激励下，2020-2022 年中国企业慈善捐赠总额均超 1000 亿元，占全国总额约 60%，表明财税激励对筹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未来可考虑专门针对气候慈善设置税收优惠（如提高个税 / 企税前扣除额度），或鼓励设立气候信托基金等工具。第三，积极发挥互联网和新媒体作用：利用支付宝、微信公益平台、“公益宝贝”等电商慈善项目，将环保公益与日常消费和生活挂钩。未来，可打造更多气候主题的网络筹款活动和社会化融资渠道。最后，需要做好 NGO 自身筹能力建设：培训公益组织掌握项目和资金管理技能，使其能够准确衔接资助者需求；或善于将环保项目与气候变化议题有效结合，增强说服力和持续性资金供给。

可以考虑的筹资体系包括：

- **气候慈善伙伴计划：**支持平台化组织和协调机制。例如，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自 2018 年启动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环境资助者合作与发展，其 2024 年发起的“气候慈善伙伴计划”旨在动员国内外慈善资源，共同支持气候项目与行业发展。通过高净值人群培育，气候慈善与商业可持续链接，慈善会系统试点推广等形式，增强公益组织与企业、高校及国际机构的联动，形成气候慈善协作网络。
- **互联网筹资平台：**进一步深化线上筹资模式。基于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公益平台（如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京东公益等）可推出更多气候相关项目和捐赠选项，利用社交媒体和直播等渠道提升公众参与度和可见度。电商平台已尝试开展环保产品与公益结合的活动，未来可推广“碳中和公益宝贝”等创新形式，吸引年轻一代捐助环保议题。
- **政策扶持与激励：**完善法律和财政支持体系。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明确气候与生态保护慈善捐赠范围，在现有《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可享受税收优惠的气候项目类别；同时对合规的气候公益组织提供政府引导基金、财政贴息等支持。根据国际

经验，税收优惠可显著提高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意愿，因此要将相关优惠政策精准应用于气候领域。

- **能力建设与话语融合：**加强公益组织自身建设。根据调研，近半数组织认为“拓展基于气候议题的筹资渠道与稳定资助”是主要提升需求，但更深层次的需求是使业务与气候议题融合。因此，应组织培训和研讨，帮助环保 NGO 掌握气候政策知识、开展应对项目的规划技能，并与政府、企业对接。这些措施将提高公益组织有效讲述气候故事和争取资金的能力，夯实筹资基础。
- **跨界合作与创新融资：**鼓励社会创新工具。可探索设立气候公益信托（如已有的“中国水源地保护慈善信托”和“碳中和慈善信托”等案例）和社会影响力投资、绿色债券等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还可以建立区域气候基金、社区低碳发展捐赠池等，形成普惠性资金池。

通过上述措施的综合施策，中国气候慈善的筹资体系将更加完善，社会各界对气候环保的参与度也会相应提高。这不仅能激发新的资金来源，也为政府、企业和上游资助者之间的协同合作搭建桥梁，为实现“3060”目标贡献民间智慧和力量。

第2章 重点议题展望

借鉴《2023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的相关调研分类方法,本报告将气候慈善领域分为温室气体减排、气候变化适应、减污降碳协同、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协同、公众宣传倡导、绿色低碳企业推动、行业基础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八大领域,分别剖析现状并提出愿景与建议。前4个重点议题以环境治理绩效为导向,后4个议题以公益行业的工作手法为导向。

2.1 温室气体减排

2025年是《巴黎协定》实施十周年。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框架,《巴黎协定》通过国家自主贡献(NDC)机制推动各国持续提升减缓与适应力度。面对全球升温仍超1.5℃路径的严峻形势,国际社会正加快行动步伐。即将在巴西贝伦召开的COP30将成为全球盘点后的关键转折点,重点讨论各国第二轮NDC的提升、气候资金落实以及适应全球目标(GGA)的具体执行路径,推动从承诺走向落实的全面加速。

在这一全球行动背景下,中国积极响应《巴黎协定》目标,于2020年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标志着国家气候战略的全面升级,并形成了以“1+N”政策体系为统领的降碳行动框架。“十四五”期间,我国整体能源和产业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在2025年达到20%的预期阶段目标,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分别下降13.5%和18%,钢铁、交通和建筑等行业的排放显著下降,政策与市场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重启,多项财税激励政策支持新能源与绿色科技创新⁶。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加强对甲烷、氧化亚氮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政策倡导的窗口和合作空间。未来“十五五”期间,我国必将进入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能源革命深化的关键时期,也将进一步加强产品碳足迹管理、碳数据披露与核算,并积极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国际挑战。

2.1.1 发展现状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中国本土环保社会组织参与气候议题的广度与深度显著提升,“双碳”政策对环保社会组织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大部分环保社会组织已敏锐捕捉到气候变化的时代大趋势。

从模式上看,当前环保社会组织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是在原有业务基础上的“嫁接式”转型,将既有优势与碳减排议题结合。例如生态保护类机构将“生态系统碳汇”作为核心切入点;污染防治类组织则借助企业污染防治形成的专业能力与模式推动减排,从企业污染数据披露延伸至碳披露制度。而基于社区场景的相关组织普遍以促进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社区废弃物管理等议题入手;自然教育类机构则侧重通过气候传播与公众教育引导社会关注。

⁶ 《国务院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情况的报告》https://www.mee.gov.cn/ywdt/hjynews/202509/t20250912_1127354.shtml

在多种路径中，气候公众教育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介入温室气体减排最重要的方式。社会组织主要通过面向学校社区开展低碳生活倡导、推动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等社区行动、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气候议题传播等方式。尽管充分利用了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契合当前社会需求且覆盖面广，但由于社区层面的碳排放数据采集和公开缺乏明确的指导标准和激励机制，较难衡量公众行为改变以及具体的减排绩效，可能面临系统性不强、资金支持力度小、成果短期化等问题。

环保社会组织还依托在传统污染物防治和环境监督等优势领域的经验，创新性地推动龙头企业的绿色转型，并在监督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ESG）信息披露方面有亮眼的进展。例如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等机构积极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绿色供应链”建设，推动房地产、服装等行业龙头企业通过采购标准倒逼上游供应商进行低碳转型⁷；上海青悦环保等机构通过环境数据库支持公众和政府对上市公司和重点国企的ESG表现监督，增强了工作专业性。在提升企业气候意识方面，万科公益基金会、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等机构积极带领企业走出去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FCCC COP），促进中国企业融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同时，通过编制分行业减排指南、开展企业“双碳”通识培训，助力行业协会理解政策、制定路径，填补了政策与实践之间的知识鸿沟。

此外，部分领先机构已开始涉足更具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探索，例如开展减排政策模型研究、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工商业的应用、探索煤炭依赖地区“气候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的实践，并尝试培育面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气候专业人才。例如，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山西大学绿色发展中心、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等组织联合发起了“煤炭公正转型交流合作平台”⁸。

在资金方面，我国本土社会组织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资金来源因具体业务方向而有所不同，其资金规模和投入方向特点主要如下：

- 从投入资金规模看，生态系统碳汇是当前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最大方向之一。《中国社会组织气候行动研究报告》⁹收集的16个资金规模达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中，“生态系统碳汇”项目占4个，较大的资金规模显示出该领域受到资助方的青睐。该领域的实践内容，除了直接开展森林、湿地（红树林）、草原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外，还在碳汇监测与核算方法学、参与地方碳汇项目设计与政策建议、构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 资金应用方向上，推动工业和企业减排的项目，资金多依赖国内外公益基金会的支持，这类项目通常聚焦政策倡导、企业碳信息披露平台和绿色供应链建设，具有较强的公共倡导性质；面向生态系统碳汇的开发项目，则更有机会获得企业资金的投入；在公众意识提升、低碳生活方式倡导及气候教育方面，资金则主要来源于国内基金会和政府购买服务。

2.1.2 主要挑战

总体而言，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机构数量占比不大，专业程度有限，

7 <https://gsc.see.org.cn/#/https://finance.sina.cn/hy/2021-06-05/detail-ikqciyzi7880399.d.html?from=wapinance.people.co>

8 <https://mp.weixin.qq.com/s/lbJ9vuQPJQEhcG0uWWr7Wg>

9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23《中国社会组织气候行动研究报告》

介入的深度与潜力和需求相比显著差距。特别是相较于国际上历史悠久、专业性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大型智库型或倡导型环保组织，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在机构数量、政策影响力、技术能力、跨行业协调、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一) 缺乏深度参与的目标和战略路径

当前，大多数环保社会组织尚未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核心愿景使命，而是将其视为原有工作的延伸。“业务叠加”的方式虽降低了参与门槛，但也限制了机构组织架构与人才队伍的创新。特别是对于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排放行业，以及与企业需求的深度结合等具有较高减排潜力的领域，本土社会组织普遍缺少深度参与的目标和行动路径，有角度影响力项目案例不多。

(二) 人才与知识储备严重不足

温室气体减排议题涉及行业政策、相关技术规范、碳数据信息收集计算等专业知识，具有行业壁垒高的特点。受访专家普遍反映，国内环保社会组织的相关知识储备、行业人脉网络、政策影响渠道基础薄弱。例如，绿色供应链领域为社会组织提供了一定的气候参与空间，但要有效切入，仍需在企业关系构建以及数据收集与分析等方面具备长期积累与相应专业门槛，非常依赖于机构的人才与知识储备。

(三) 筹资困难制约长期发展

当前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资金主要依赖基金会资助服务，除了少量政府资金及在碳汇领域有企业投入外，总体资金的体量十分有限。这不仅限制了社会组织在新业务上的探索与试错，也削弱了培养与留用相关专业人才的能力。国际基金会虽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投入资金体量大¹⁰，但往往聚焦能源、工业、交通等对专业能力要求高的领域，与我国本土社会组织既有业务的匹配度有限。

面对挑战，社会组织需要培养人才，提升专业能力，制定明确的战略发展方向，转变筹资思路，主动寻求与企业和政府实际需求的深度融合，更精准地对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成果要求，才能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持续推进和深化气候减排行动。

2.1.3 2030 展望与建议

一是精准对接企业 ESG 与碳减排需求，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和 ESG 投资的兴起，企业对减排路径规划、绿色供应链管理、碳信息披露等服务的需求将不断增长。社会组织应发挥独立、专业、贴近一线的优势，可以为企业群体、行业协会开发标准化的能力建设服务产品，提升减排数据的公信力，协助行业龙头企业管理供应链碳排放，提升 ESG 绩效，并发起符合产业和市场特点的温室气体减排行业行动倡议。通过提供高性价比的专业服务，不仅有望获得企业付费或资助，更能将自身业务深度嵌入企业运营，从而推动行业系统性变革。

二是深挖政策协同空间，增强社会与环境综合效益。环保社会组织应加强对地方和部门政策的研究，将相关业务与政府碳减排、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业保障、生态保护等目标相结

¹⁰ 根据国际组织气候工作基金会报告《Funding trends 2024: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hilanthropy》，2023 年全球气候慈善支出在 93 亿美元到 158 亿美元之间，其中有 126 亿美元投入温室气体减排。

合，提升协同性和政策影响力。例如深度参与全国和地方碳市场建设；在农村社区的场景下，推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与乡村振兴结合，促进农村能源转型与集体增收；在碳汇开发与核算中，将目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生计改善相结合，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理念和案例纳入地方生态修复规划；在资源型城市或高碳产业聚集区，关注转型中受影响的群体，探索支持再就业培训和社会稳定的“公正转型”项目等。

三是聚焦“小而美”的创新试点，打造可复制的低碳场景。在基层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本土社会组织拥有更大探索空间。在人员和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可以在本地集中资源打造“小而美”的减排示范项目，如低碳社区、零碳校园、绿色办公空间等，重点呈现光伏应用、垃圾分类与资源化、绿色出行的协同，通过探索技术可行、规模可控、易于管理、能直观展示减排成效的模式，提升公众参与感和获得感，为更大范围积累实践经验与案例提供支撑。

四是开拓以甲烷为代表的新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环保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议题讨论，协助地方政府和企业解读政策，在生态农业、社区废弃物管理等场景下试点甲烷和氧化亚氮减排解决方案，连接科学与公众，提升全社会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认知；促进国际合作和最佳实践分享交流。

2.2 气候变化适应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加剧，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包括高温热浪、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也包括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退化以及农业与水资源安全的威胁。气候变化已关乎国家安全、经济韧性与社会民生，适应成为核心战略任务。

“十四五”期间，中国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取得显著进展。2022年，国家通过《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重点推进气候监测预警、生态系统修复和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建设等气候韧性建设，初步形成政策体系。截至2025年，全国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印发省级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39个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取得实质性进展。

展望“十五五”，中国将以“基本建成气候变化适应型社会”为总目标，重点提升监测预警能力至国际先进水平，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试点扩展至100个，持续增加红树林面积，农业耐逆品种覆盖率提升至80%以上，通过科技赋能、区域协同和国际合作全面增强经济社会系统的气候韧性。

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全球气候适应目标”（Global Goal of Adaptation, GGA）取得了一定进展。2023年末，各缔约方在COP28达成整体框架，列举了广义上的全球适应目标和亟须采取行动的关键领域，为接下来的全球适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2.1 发展现状

社会组织正逐步成为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我国环保社会组织近几年普遍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适应问题，以其贴近基层、灵活高效、关注脆弱群体的独特优势，逐步在推动社区气候变化适应方面展现出显著的价值与活力，成为连接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的关键力量。

在当前环保社会组织参与气候变化适应的行动模式中，以“社区为本”是一大亮点。例如自然之友通过招募积极行动者、组织培训等形式支持草根先锋行动者，增强了社区的内生动力与组织韧性；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简称“云南协力”）聚焦气候风险识别与社会组织和行动者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建设，通过气候变化知识共学、工具研发与应用等方式，促进跨领域联合；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简称“千禾社区基金会”）推动老旧城中村居民自组织培育应对暴雨内涝风险；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简称“海南智渔”）通过推动多元生计转型帮助沿海渔业社区的应对资源退化挑战；农民种子网络通过村庄作物品种多样性保护增强农业系统对极端气候的适应力等。这些实践不仅有效提升了公众的气候意识与应对能力，也形成了可持续的气候变化适应自组织网络，支持地方战略进一步落地。

在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中，本土社会组织特别关注老人、农民、低收入及妇女儿童等脆弱群体，体现了气候公正理念。与此同时，在气候防灾减灾等行动中体现了灵活性、创新性的独特优势。它们能够根据地方实际设计干预策略，如在社区中开展气候风险评估调研、制作“社区风险地图”等，进行贴近居民生活的适应行动。

此外，公益组织在适应气候变化危机中行动的具体实践并非均衡，生态系统保护等方向较少有组织涉足。相较于防灾减灾、公共卫生等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生态保护领域社会组织的行动通常较少被作为适应行动呈现。而生态系统保护是增强生态系统韧性、适应气候变化危机的一种方式，两者在理论上存在显著且紧密的关联，长期不容忽视。

社会组织间的气候变化适应交流合作平台及网络协同也正兴起。例如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从2019年起开始倡导国内主要环境类基金会关注气候适应变化议题，发布了《CEGA气候变化适应资助策略报告》、《CEGA气候变化适应差距分析报告》，举办国际国内气候变化适应论坛，工作坊，国际国内气候变化适应共学营等，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组织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工作的开展。另外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主持的“多议题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组织不同议题领域的公益行动者进行多议题气候融合的共建共学；千禾社区基金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气候变化适应专题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五届，触达数十家社会组织，为领域意识提升提供了平台；云南协力与千禾共同发起的“和气行动”组织的气候风险评估工作坊，使得不同社区的实践经验可以相互比较和学习；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联合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爱德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气候同行者”则通过分工合作，分别聚焦于减排、韧性建设和组织发展；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恒星伙伴计划”、自然之友牵头的“玲珑计划”构建了行动者赋能网络，提供资金、信息和能力支持。此外，地方社会组织网络也陆续兴盛，包括广西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成渝社会组织气候变化网络、陕西组织发起的钟楼气候等。这些协同模式，大大提升了行业的整体效率和影响力。

同时，社会组织在气候变化适应行动中展现出很好的跨界协作能力，注重搭建与科学界、政策制定者、以及商业的沟通协作。例如，万科公益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推动极端天气对脆弱人群的健康影响；云南协力与科研单位合作开发社区气候风险评估指南工具；海南智渔与农业保险机构合作，共同设计开发罗非鱼养殖收入保险¹¹。这些合作中社会组织通过跨界协作，扮演“连接者”与“催化者”角色，在打破领域壁垒，整合多元资源，将科学知识、政策目标、社区需求与市场工具有效衔接方面成效突出，为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气候变化适应治理体系发挥的积极作用。

11 WWF. 2022.《中国可持续渔业金融基线调查报告》

但总体来看，气候变化适应议题在环保公益组织中仍然处于认知的初级阶段，重要性并未被充分认知。这与我国气候变化适应的整体发展阶段基本一致。目前国内直接支持气候变化适应议题的基金会不多，用于支持探索性的试点项目和组织能力建设，资金规模有限。而适应在全球范围内也更多被视为一个地方性问题，尽管国际社会乐于看到中国在适应领域的实践探索，国际基金会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气候减缓项目。值得注意的是，救灾、公共健康和生态韧性等领域的公益资金一定程度上支持着气候变化适应建设，并且相较于防灾减灾、公共卫生等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生态保护领域社会组织的行动通常较少被作为适应行动呈现。而生态系统保护是增强生态系统韧性、适应气候变化危机的一种方式，两者在理论上存在显著且紧密的关联，长期不容忽视。

社区的气候适应行动高度依赖在地化设计，目前其复制推广的潜力还相对受限。同时，气候变化适应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洪水预警系统、农作物抗旱品种研发、城市海绵系统建设，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和弱势群体的保护，缺乏一个集中的、可被单独管理的目标“抓手”，需要社会组织从更宏观、更系统的角度思考和探索。

2.2.2 主要挑战

组织使命与气候议题融合的困难，是当前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据《NGO 气候行动需求调研报告》¹² 调查，54.6% 的受访组织表示缺乏气候变化的相关专业能力，近 30% 难以将气候变化议题与其核心业务有效融合。部分环保组织较早接触气候变化议题，但缺少将议题带入现有业务模式的切口。而教育和社区服务类组织虽看到服务对象深受气候影响，却缺乏用气候变化适应理论嵌入主营业务的逻辑与方法，导致资源投入不足，行动碎片化。

专业能力不足是另一关键挑战，不少环保组织如果无法清晰地理解其核心业务（如农村社区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设计出系统性、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无法有效向资助方和公众有效讲述其工作的气候价值。同时，面对如此复杂的议题，资助方也需不断提升对于适应工作的理解，了解社会组织在推进实践中的结构性挑战。

资金也是核心制约之一。当前气候公益资金的结构失衡，相比减缓领域的公益资金注入，适应项目因其无形和长期性难以量化，导致资助意愿低，社会组织在开展气候变化适应行动中仍面临较为严峻的资金困境。

2.2.3 2030 展望与建议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带来的灾害损失加剧，公众风险感知的增强为公益行动提供了肥沃土壤。公益组织应当将抽象的气候变化风险转化为具象的个人风险（如高温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等），从而有效激发公众的参与意愿。

政策框架的确立提供了战略机遇，自《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发布以来，各省市陆续出台地方行动方案，并开展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试点。从中央的宏观规划到地方的细化方案，正在为公益组织创造行动空间，可以利用在社区的实践经验，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策落地的创新模式。

气候变化适应的资金潜力预期将显现。一方面，社会组织可加强与地方气候变化适应主

12 北京益行公益信息交流服务中心联合 26 家公益组织发起了“NGO 气候行动”需求调研活动，形成的《NGO 气候行动需求调研报告》

管部门（如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住建、水务等部门）的合作，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参与气候变化适应试点城市建设等方式，争取公共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可与现有的防灾减灾、社区应急项目深度融合，将气候风险预测与长期韧性建设纳入传统救灾体系，从而接入更稳定的项目资金流。此外，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企业气候韧性需求也为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可以设计为与企业业务结合较为紧密的模式。

面向 2030 年，环保社会组织应当紧紧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目标，积极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深化“大题小做”的实践路径。社会组织应聚焦如城市社区内涝、乡村振兴等具体场景，开展气候风险评估，并将气候韧性建设纳入嵌入现有业务，开拓与社区发展、防减灾、公共宣传教育等领域的跨界合作，实现“业务 + 气候变化适应”的融合创新。同时，构建和利用区域性行动网络，通过共享资源、经验与技术，提升社会影响力，并加强与基层政府合作。

二是扩大气候变化适应方向的公益资金供给。基金会等资金提供方应当建立气候变化适应与本机构战略目标关联性的深度分析，有条件的基金会可以设立独立或联合（包括与企业）设立联合气候变化适应基金，强化与扶贫发展、抢险救灾等非气候基金会的合作，将气候议题与发展议题结合，扩大公益资金供给。

三是应当加强行业能力建设。应当大力投资于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能力建设和知识生产，如资助相关培训、政策解读工作坊、案例研究出版等；支持网络化行动与平台建设，资助区域性枢纽组织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提供 3-5 年期的小额资助以支持长期项目，帮助组织打通业务与气候的话语体系，提升专业能力。

2.3 减污降碳协同

过去十年，在国家强有力政策推动和严格的环境监管下，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进展，污染治理取得了决定性的好转。2024 年，全国 338 个城市 PM2.5 年平均浓度降至 29.42 微克 / 立方米，较 2020 年末下降 9.72%，地表水水质优良（Ⅰ - Ⅲ类）比例由 2020 年 12 月的 84.6% 提升至 2024 年 12 月的 93%¹³，受污染土壤安全利用率在“十四五”期间稳定在 92% 以上，湿地保护率提升至 55% 以上。

然而，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形势仍然严峻，与绿水青山和“美丽中国”的伟大愿景仍然有相当的距离。随着我国环境污染治理趋严，企业的污染行为变得更为隐蔽和复杂，工业园区夜间偷排、暗网偷排等现象仍时有发生，监管难度加大。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下，未来的环保工作需要实现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协同。进入“十五五”阶段，污染防治将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在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系统治理、协同增效和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

2.3.1 发展现状

我国污染治理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环保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在《新环保法》、中央环保督察、环境信息公开和公益诉讼机制构成的组合政策框架下，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已从边缘

¹³ https://www.cnfin.com/hg-lb/detail/20250523/4238405_1.html

的“揭黑者”转变为有法可依、有路可循的污染治理重要参与者，逐渐形成了“信息披露、公众参与、行业协作、法治建设”四大主流工作模式，并构建了多个高效的合作平台，形成了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

例如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通过搭建“蔚蓝地图”平台，成为推动公众和企业参与污染治理的“数据基础设施”，其“绿色供应链”项目利用国际品牌的采购杠杆，倒逼上万家供应商进行环境整改和数据公开。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等组织迅速响应《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启动新污染物数据服务产品研发。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利用无人机和红外热成像技术，突破化工园区高墙的监管盲区，精准识别隐蔽排污行为。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开发的“巡河宝”¹⁴小程序，极大降低了公众参与河流治理的门槛。无毒先锋牵头的“化学品安全民间合作网络（CSN）¹⁵”、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联合合作方共同发起的“卫蓝侠”等项目，致力于搭建污染治理领域的合作平台，促成多方对话，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细分议题的集合影响力。自然之友等组织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成功推动企业整改。

虽然传统重污染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但污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污染治理不再局限于末端控制，而是需要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绿色金融等宏观议题深度融合。与此同时，塑料污染问题也日益严峻，成为公众日常生活中的显著环境负担。新型污染物，如微塑料、抗生素、全氟化合物等，因其隐蔽性强、来源广泛、健康风险高，治理难度大。

2.3.2 主要挑战

环保社会组织在污染防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们当前仍然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

首先，随着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污染问题大幅改善，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有所减弱。环境的向好但行政诉讼渠道的收窄，使得公益组织更多依赖民事公益诉讼，而数据公开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弱化和退步现象。

其次，资金不足成为关键瓶颈。行业资金最主要的来源是国内基金会资助以及政府购买服务。近年来，部分基金会减少了对污染议题的资助，本土筹款压力增大。政府购买服务为一些机构提供了收入来源，但其内容多集中于较低影响力的领域，可能限制公益组织的专业深度和独立性。当前污染防治议题伙伴的资金趋向紧缩，部分中低收入组织因资金不足而减少了环保活动，行业呈现“第一梯队”稳健发展、“中腰部”以下组织萎缩的分化趋势。

最后，新兴议题对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企业碳减排需求的不断提高，公益组织需要抓住“双碳”目标下的企业披露新要求，要求组织具备极强的战略应变能力，特别是从过去“发现问题”的模式，转向“解决问题”的模式，从深耕单一议题转向跨领域整合，能力迭代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挑战。面对“减污降碳协同”和“新污染物治理”等复杂议题，组织需要跨越传统环境科学的边界，融合气候、健康、经济、法律等多领域知识。

14 河流守望者《2024年河流巡护报告》

15 化学品安全民间合作网络（CSN），简称为“化学品网络”。英文名称为“Chemical Safety Network”，简称为“CSN”。CSN是由中国境内多家公益机构发起的非营利的民间合作网络，期望到2030年，各国政府、学界、企业、民间等利益相关方，合力建立起健全的化学品管理体系，使得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不再遭受有害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严重威胁，与之相关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也能顺利实现。同时，逐渐健全的中国化学品管理体系。

2.3.3 2030 展望与建议

展望 2030 年，中国公益行业在减污降碳协同领域将呈现议题协同化、技术智能化、关注中西部和农村的三大转型方向。

一是议题协同融合。例如，环保组织要抓住“双碳”目标下的企业披露新要求，积极将传统环保业务与气候议题关联。伴随着减污降碳协同的政策导向，环保议题的边界从污染治理延伸至能源、产业、金融、城市规划等领域。这为公益组织提供了参与碳核算、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等新切入点，能够将传统环保业务与气候议题关联的组织将获得更多关注。

二是技术智能化提升效率。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分析将被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和碳核算，结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将构建无死角的监管体系，实现对暗管排污、夜间偷排等隐蔽行为的精准打击。环保公益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发现环境问题的能力，探索运用领域“技术 + 数据”模式，并持续学习新议题知识，以适配未来行业发展不断提高的专业性。

三是关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中国污染防治仍存在城乡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农村污水处置率低、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依然是突出短板。随着部分高污染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污染问题的地理坐标也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未来的环保工作需具备更强的社会公正视角，同步将关注点转移到中西部和农村地区。

2.4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协同

中国已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全国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积超 8000 万公顷，基本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预期目标，90%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 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得到有效保护¹⁶。各地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和科普活动，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深入人心。

“十五五”阶段，中国将继续强化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种质资源保护，扩大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建设，突出碳汇与气候韧性的协同效应，并持续推进公众科普教育，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国际上，《昆明 -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 2030 年前“30×30 目标”（到 2030 年，有效保护和管理至少 30% 的陆地和内陆水体以及沿海和海洋区域），也为各国制定和落实生物多样性政策提供行动指南。

2.4.1 发展现状

环境公益组织一方面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实地保护项目，推动濒危物种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建设等具体实践，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案例参考；另一方面，气候及环境公益行业还通过公众教育、志愿者行动和社区参与等方式，提升全社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此外，公益机构积极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植树造林等生态保护领域，促进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发展。当前我国生态保护修复领域里已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公益 + 公众行动的多元共治格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协同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突破：

16 “十四五”生态保护修复预期目标基本完成 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504/content_7020437.htm

首先，更深度地介入了政府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越来越多拥有硕博学位或海外留学背景的专业人才进入行业，专注于弥补政府在物种监测、廊道规划等方面的资源短板，提供灵活、专业的调查和研究服务。许多行业专家被纳入国家公园法改革、COP15 决策咨询等重要政策的征询过程，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其次，行业的专业化程度明显提升。例如雪豹调查、物种监测、气候变化宣传与公众科普等工作的专业化，促进了公益行动与国家政策的有效融合，使公益保护成为社会主流化的一部分。无论是“蚂蚁森林”这样开创性的公众参与项目成为行业标杆，还是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简称“山水”）、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简称“GEI”）等机构在国内建立的生态保护地以及社区治理体系，都标志着行业整体专业度的提升。

再次，领域内的公益与企业的合作更加紧密。公益机构利用其专业能力，回应企业在 ESG、CSR 或技术应用方面的诉求，转化为有效的保护行动。例如，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民生通惠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千岛湖水基金，以世界银行新安江贷款项目为依托，与多家知名国内外企业共同启动“水补偿”项目，在重要水源地千岛湖、寿昌江、太浦河等地开展流域保护项目¹⁷。

最后，联合与协作已经成为行业常态。面对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公益行业意识到“联合行动”的重要性。无论是资助方层面的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还是自然保护协会（TNC）、桃花源基金会等 23 家公益机构联合发起行动者层面的“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GEI 等多家机构创始的“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等，各类平台的建立促进了机构间的连接与协同。

2.4.2 主要挑战

尽管成就斐然，但展望未来，生物多样性公益行业仍面临多重挑战。主要挑战包括：

一是资金来源的结构性困境。一方面，该议题由于涉及到保护地等敏感区域，使得国际资金接收难度增加；另一方面，国内尚未形成稳定、长期的捐赠文化，企业捐赠和社会支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面临不确定性，导致资金链出现一定的紧张趋势。

二是专业人才仍然不足。与国际大型 NGO 相比，我国社会组织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深度和专业人才储备上仍有很大差距。能够开展在地保护实践，又能够与不同利益相关方有效沟通，既懂专业又熟悉实践的人才较为稀缺。

三是与气候变化议题的协同不足。目前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两大议题常常割裂对待，仅将另一议题作为“顺带”的协同效益，缺乏深度融合的设计与规划。这种脱节不仅存在于项目层面，也体现在组织间缺乏协同机制的层面。例如公益组织在推动新能源布局时，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未被充分考虑，错失了实现多重效益的机会。

2.4.3 2030 展望与建议

面对挑战和机遇，建议行业重点关注以下方向：

17 <https://mp.weixin.qq.com/s/NWxKMI-lOUdZB2dTvFvh1Aq>

一是战略抬头看。积极对标全球与国家战略框架，主动学习和研究“昆明-蒙特利尔框架”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等宏观框架，对标和识别自身工作的独特贡献。在如OECMs（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等政府尚未全面铺开的领域进行模式探索，能让机构的工作融入更宏大的叙事，也能在与政府和国际对话时掌握话语权。

二是开拓企业合作。机构需要真正理解企业的运作方式和需求，增加服务性收入，变“筹款”为“共创”。通过将企业的ESG目标、技术优势和市场资源与保护目标深度结合，共同设计能够产生环境、社会和商业多重效益的创新项目。同时，公益机构应进行战略梳理，明确自身的核心优势和业务边界，避免为了生存而盲目追逐资金，导致业务泛化和背离使命。

三是探索气候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方案。应当从理论到实践阐释和展示协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意识地设计和落地一批类型丰富的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示范项目。例如通过一个城市口袋公园的改造，同时实现提升生物多样性、增强社区气候韧性和公众自然教育的多重目标，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和资助方提供可见、可感的解决方案。

2.5 公众宣传倡导

环境议题天然具有公共性与传播性，容易通过教育、体验、互动等形式触达公众，形成社会共识。“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牵头发起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环保社会组织联盟，并多次发起了环境宣教作品评选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公众环境宣传；同时，“互联网+公益”模式逐渐成熟，数字推动低碳自觉。蚂蚁森林等平台与社会组织开展广泛合作，将公众日常低碳行为（如步行、线上缴费）量化为虚拟能量或公益金，有效激励公众参与。

“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更加注重生态文化体系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推广和数字化转型深化，聚焦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充分发展和传播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生态文化，提升生态文明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2.5.1 发展现状

环境公众宣传倡导是我国环保公益组织最活跃、组织数量最多的工作领域。据《2024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公众宣传倡导是受访环保组织运用最普遍的工作手法，覆盖了从城市社区到县域基层、从青少年教育到企业合作的广泛场域。一方面，其门槛相对较低、灵活性强，适配中小型组织尤其是初创社会组织以及县域志愿服务团体的运作能力；另一方面，环境议题天然具有公共性与传播性，容易通过教育、体验、互动等形式触达公众，从而形成社会共识。更重要的是，在环境法治与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的今天，公众意识的唤醒、行为习惯的重塑、社会监督力量的培育，是推动环境治理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

社会组织开展环境公众宣传倡导的工作类型日趋多元，已从早期单一的信息灌输、口号式宣传，逐步演化为以“兴趣导向”“社区自组织”“陪伴赋能”为核心的参与模式。兴趣导向型倡导以“有趣”和“长见识”为切入点，降低公众参与门槛，通过社群化运营形成稳定黏性，进而潜移默化地提升环境意识。社区自组织型倡导则依托在地信任关系，通过具体、可见、可操作的行动，实现从个体行为到社区网络的扩散效应，基于兴趣推动行为转化。陪伴赋能型倡导则更注重长期能力建设，如自然之友的“玲珑计划”、合一绿学院的“垒土行动”，通过系统培训、导师辅导、项目孵化等方式，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宏大议题拆解为普

通人可落地的日常实践。相较之下，传统的单向传播型模式（如地铁广告）虽然覆盖面广，但互动性弱、留存率低，目前已逐渐作为补充手段存在。

在当前形势下，社会组织的环境公众宣传倡导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新特点。

首先，传播策略从广撒网转向精准触达，社会组织不再追求泛泛的“爆款”效应，而是面向特定人群（如年轻父母、Z世代、社区主妇、企业员工）设计分众化内容，结合其生活场景与兴趣点进行“软植入”。例如自然之友与果壳合作推出的气候变化适应AIGC互动测试¹⁸，将复杂科学知识转化为趣味问答，极大提升了公众感知度。

其次是技术赋能成为新常态。无人机、手机拍摄降低了内容制作门槛，“垃圾随手拍”、“巡河宝”等公民科学工具将分散的个体行动数据化、可视化，不仅增强了公众参与感，也为政策倡导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再次，跨界协同成为主流趋势。公益组织越来越多地与商业平台（如美团“青山计划”）、科技企业（如阿里巴巴、京东）、媒体机构（如一席、哔哩哔哩）乃至政府部门合作，形成公益提供议题深度、商业提供流量与技术、政府提供政策接口的资源互补模式，极大提升了传播效率与政策影响力。

最后，顺应青年受众偏好，倡导内容从“灾难叙事”向“希望叙事”转变，在提升危机意识的同时，更强调个人行动的有效性、生活品质的提升与环保行为的包容性，转而激发内生动力。

2.5.2 主要挑战

首先是专业度正在被“比下去”。随着主流媒体、商业机构乃至文旅公司、教育培训机构纷纷入场，承接了大量原本由公益组织主导的自然教育、研学旅行和环保科普项目。这些机构往往拥有更强的资金实力、更专业的视觉设计能力、更成熟的市场运营经验，而公益组织在内容创意性、趣味性、视觉呈现力上相形见绌。

其次，对新媒体与新模式应用的力不从心。多数公益组织缺乏专职传播人才，内容生产依赖兼职或外包，难以在短视频、直播、播客等新渠道上形成持续、稳定、有辨识度的内容输出。

第三，环境议题本身面临“边缘化”风险。随着传统污染显性问题得到缓解，公众对环境危机的紧迫感和敏感度在下降，环保议题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被娱乐、消费、社会新闻等挤压。公益组织若仍停留在以往理念倡导、知识普及层面，缺乏与公众日常生活、情感需求、身份认同的深度连接，便难以引发持续关注与行动。

第四，资金在持续收紧。在资金来源上，公众宣传倡导类组织主要仍以国内基金会资助和政府购买服务为主。据多位专家透露，项目经费多为短期，缺乏对组织能力建设、人才培育、长期议题深耕的稳定投入。若资金紧张，组织无法投入足够的资源制作优质内容，也难以突破圈层、形成广泛传播。此外，自然教育研学虽进行市场化探索，但其环保教育效果往往转化率不高。如何在保持公益初心与专业深度的同时，设计出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又能实现环境行为改变的产品与服务，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难题。

18 <https://mp.weixin.qq.com/s/XTjugxK3K4FxctLHTerig>

2.5.3 2030 展望与建议

展望未来，公益组织在环境公众宣传倡导领域的角色，不应是与商业机构或政府部门“抢地盘”，而应是回归其“先锋探索者”和“专业桥梁者”的生态位。随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新污染物等议题日益严峻，公益组织必须继续走在主流视野之前，率先发现、研究和传播这些尚未被充分认知的风险。

为此，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强化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环保社会组织应强化“议题聚焦”与“专业深耕”，避免“什么热，做什么”，而应在细分领域建立不可替代的专业权威，成为政府、企业、公众信赖的知识源与行动伙伴。对外合作方面应更主动地嵌入政策进程与企业价值链，同时深化与电商平台、快消品牌、物流企业的合作，将环保倡导嵌入其业务场景。

二是在项目设计中加入传播思维。环保社会组织应当加大在传播人才、数字工具、视觉设计上的投入。配置专职或稳定的兼职传播人员，与专业机构建立长期合作，提升内容生产力与传播力。应从追求“曝光量”转向追求“活跃度”与“行动转化率”，通过线上社群等形式，建立高黏性的核心支持者群体，形成稳定的行动网络与筹款基础。

三是推动行业协同与资源共享。环保社会组织应当通过联合调研、联合倡导、能力培训，建立“协同网络”与“资源共享平台”，避免重复劳动，放大集体影响力。重视与结合国家科普工作计划结合，持续支持实现科普目标。

2.6 绿色低碳企业推动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我国绿色行动的重要实践者。在当前全球绿色发展的大趋势下，政府政策、投资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 ESG 行为的要求，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相关标准，共同形成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强大外部推动力，绿色制造体系加速构建，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从 2021 年的 2783 家增至 2024 年的 6430 家¹⁹。“十四五”期间参与碳市场的企业达到 2096 家，成交额达 474.1 亿元。

当前中国企业的绿色发展正经历从“被动合规”向“主动转型”的战略性演进，呈现出显著的“头部领先、尾部落后”的分化格局。头部民企与大型企业是我国企业绿色发展的主力军，它们已将“碳中和”或 ESG（环境、社会及管治）理念纳入核心发展战略，设立专门的 ESG 管理部门并定期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展现出较为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布局。部分大型企业从早期被动接受国际买家要求，开始转向主动运用 ESG 标准来规范自身发展，引领行业趋势。标普全球《可持续发展年鉴（中国版）2025》显示，2024 年 1662 家中国企业参与可持续发展评估，164 家入选年鉴，其中 66 家获行业表彰，可持续理念加速普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在绿色转型方面明显起步较晚，对“双碳”等宏观政策认知不足、绿色技术和管理能力欠缺、转型资金、人才有限以及内在动力不足。这些企业多为被动型参与，其相关绿色改造行动多是迫于政府监管或供应链等外部压力。需要注意到的是，部分发达国家业界对 ESG 行动的态度出现反复，也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19 https://www.cnfin.com/hg-lb/detail/20250523/4238405_1.html

2.6.1 发展现状

社会组织是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推动模式和案例。中国公益组织在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已从早期以环境监督和公众倡导为主的单一角色，逐步演化为集标准共建者、能力赋能者、价值共创者于一体的多元行动主体。

在工作类型上，社会组织的介入已覆盖企业绿色转型的各个环节：在前端，通过政策研究与行业对话，协助政府完善绿色治理框架，例如推动上市企业 ESG 信息披露、参与碳市场规则设计；在中端，聚焦企业能力建设，针对龙头企业的绿色供应链建设、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等痛点，开发数据库、工具包，开展定制化培训，提供一对辅导；在后端，则通过发起行业联盟（如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的中国企业气候行动（CCCA）），参加气候变化 COP 大会等方式，引导龙头企业协同减碳。

与此同时，公益组织需要积极探索与企业核心业务深度融合的价值共创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CSR 捐赠或环保宣传，而是围绕企业产品设计、物流优化、包装减量、员工行为改变等价值链环节，共同设计兼具传播力与实效性的项目。受访大型企业人士认为，企业现今的 CSR 活动越来越倾向将核心技术用于社会价值创造，更青睐于有传播性、可讲故事、与业务结合紧密的公益项目。将环保目标嵌入商业流程，实现社会效益与品牌价值的双重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际气候治理舞台上，以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为代表的机构，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代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FCCC COP），搭建“中国角”边会平台，促成中外 NGO、企业、地方政府的对话。C Team 在 COP29 期间发布《中国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并推动“中国企业气候行动网络（CCCA）”建设，有效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能见度与话语权。

但总体而言，我国社会组织中有能力参与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的机构数量十分有限。除个别机构已经构建了较为成熟的模式之外，大部分环保公益组织在专业性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方面，还与企业的需求有一定差距。

2.6.2 主要挑战

首先是专业能力与企业需求之间的显著落差。当前企业，包括龙头品牌企业、拟出海或已布局全球市场的企业，对碳足迹核算、产品生命周期评估、TCFD 框架应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合规应对等议题的需求日益精细化、国际化。而多数环保公益组织缺乏相关复合型人才，难以提供与咨询公司竞争提供专业服务。虽然在企业“出海”的进程中，公益组织本可扮演风险预警、社区关系协调、本地 NGO 对接等关键角色，但现实是绝大多数机构缺乏海外项目经验、不了解东道国法规与文化、缺少在地合作伙伴网络，导致其在企业国际化战略中几乎没有存在感。

其次是缺少机制创新能力。中国公益组织尚未能主导或深度参与具有全球公信力的企业气候参与机制建设，如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²⁰ 均由国际大型公益组织发起并主导，国内组织多处于跟随或本地化执行角色，缺乏原创性制度设计能力与国际话语权。

²⁰ SBTi 是碳信息披露项目（CDP）、联合国全球契约（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全球合作项目。

三是资金约束明显。这个领域的发展需要具备企业背景的人才，甚至是在企业 ESG、碳金融、绿色供应链等领域的实战经验。由于资金常常周期短、额度小、缺乏能力建设专项支持，难以进行长期行业研究和人才梯队培养。

2.6.3 2030 展望与建议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绿色转型是关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选项”。气候变化导致的供应链风险、环境问题引发的品牌声誉危机、投资方对 ESG 风险的严格审查，都使得绿色发展成为企业增强韧性、保障长期存续的基础。加之绿色技术的应用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协同实现降本增效，因此企业也视绿色科技和相关产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企业参与其中可以获得新的技术、产业和市场机会。

当前海外绿色贸易环境的日趋严格，如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零毁林法案》(EUDR)，以及国际金融公司 (IFC) 的《环境与社会绩效标准》等，均要求企业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与信息披露，建立可追溯、可验证的负责任采购体系。公益组织可为企业提供“标准翻译”与“能力嫁接”服务，将国际 ESG 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本地化指标与工具包，协助企业建立碳足迹核算模型，提升其合规能力。与此同时，绿色金融与气候投融资的兴起为公益组织提供了新的资源渠道。对于财政部在境外发行绿色主权债券，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联合启动气候投融资试点等工作，公益组织可以参与协助中外金融机构及政府参与国际绿色金融交流与能力建设中，将公益项目设计成具备可测量社会回报的投资标的，与银行、保险、主权基金等机构合作，撬动更大规模资本。

此外，ESG 走向深化，不少企业已经设立了 ESG 专职岗位，加入国际重要的碳减排承诺机制，主动披露环境相关数据，这种主动对接国际行业标准的方式以提升企业透明度和满足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也正在成为加入国际市场企业的实践方式。

展望 2030，公益组织若要在企业绿色转型中扮演更具战略性的角色，必须实现从“监督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型。这要求组织在能力上构建“懂政策、通行业、精技术、善协作”的跨界团队，在模式上探索“公益 + 商业 + 科技”的融合创新路径。

一是主动向企业的具体需求靠拢。社会组织需要主动学习企业逻辑，深入理解特定行业的政策、运行特点与需求痛点，将宏大的社会目标转化为能够与企业核心业务相结合、兼具社会与商业价值的具体解决方案。在国际化维度上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 ESG 合规咨询、社区沟通培训、本地 NGO 对接等前置服务，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绿色规则制定，输出中国民间智慧。

二是要着力破解自身专业能力的短板。通过引进跨界人才、建立专家网络或与专业机构结盟，补齐企业在企业 ESG、碳资产管理、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不足，从而能够更好地提供专业的产品、建议与服务。

三是加大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创新。资助方应加大对该领域的战略性投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组织深耕特定行业或区域，鼓励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评估工具、数据库与方法论，并资助人才引进与国际交流，尤其支持其参与 SBTi、CDP 等国际机制的本地化与话语权建设。

2.7 行业基础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在推动环境治理、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过去十多年，中国环境公益经历了从“草根自发”到“行业自觉”的关键转型，行业作为连接政府、企业与公众的桥梁。《“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等文件明确要求“引导支持环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将其定位为“全民行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成熟，社会组织可以作为原告，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成效显著，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领域案件34.8万件²¹。

随着“十五五”规划的推进和“双碳”目标的深入实施，环保社会组织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包括碳普惠机制推广、ESG新规落地、生态文化建设深化、数字化转型加速等。2024年ESG强制披露²²带来和企业合作碳核算、环境信息披露咨询、供应链环保审核、利益相关方沟通等服务的市场机遇。2025年，“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实施方案要求各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为环保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角色定位和参与路径。

同时，全球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导致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直接影响到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捐赠意愿与能力。国际资金减少、监管趋严等现实压力，要求行业必须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2.7.1 发展现状

从发展的角度看，行业建设仍然存在议题专业性不足的问题，表现在大量基层的环保组织倾向公众宣传和组织活动，对减污降碳、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议题上缺乏足够的科学认知、技术工具与政策接口。从管理的角度看，行业中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品牌传播人才缺口突出，在一些较为成熟的组织中，也存在从战略决策到对外影响力过度依赖创始人的问题。在对外合作方面，环境社会组织交流有余、合作不足。跨机构、跨议题的网络虽初见端倪但影响力尚未形成，在大部分机构体量较小的情况下，议题的社会效果难以显现而形成合力。

为提升环保社会组织的成长，行业设立了多个有影响力的支持项目和平台。例如由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简称“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发起的创绿家项目和劲草同行项目。由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执行的“银杏伙伴”项目等。这些行业组织和人才建设项目不仅提供培训和资金，更注重于对人能力的建设，通过系统的知识分享、网络构建为行业培养了一批核心专业人才。

在基础设施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成为亮点。河流守望者“巡河宝”将公众巡河与数据众包结合，截至2024年已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巡护河流总数达

21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600430

22 4月12日，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上海、深圳和北京三大证券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该指引于5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该指引对上证180指数、科创50指数、深证100指数、创业板指数等重要市场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强制要求其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这些公司须于2026年4月30日前发布按照《指引》规定编制的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

9298 条²³，成为“技术降低参与门槛”的标杆。行业内涌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工具包和数据库，例如劲草同行针对成长期组织瓶颈的标准化课程“疾风充电站”；IPE 蔚蓝地图、上海青悦环境数据库积累的大量环境质量实时数据，为行业伙伴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围绕特定环境议题形成的行业内平台建设方兴未艾，如“零废弃公益联盟”、“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²⁴”等，通过资源整合与协同行动，提升了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性和影响力，形成了“小机构、大网络”的高效合作模式。

2.7.2 主要挑战

首先，专业人才的短缺问题日益突出。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化、综合化，对从业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公益行业普遍存在的薪酬待遇偏低、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等问题，导致人才吸引和保留困难。许多快速发展的志愿者和社区组织缺乏对环境议题的深入理解以及基本的调查和分析能力。

其次，资金的可持续性是行业发展的核心制约。随着资助格局的变化，来自公众、企业和政府的短期项目制资助逐渐成为主流，战略性、中前期以及核心支持性资助的比例较低。大批一线组织获得的资助有金额少、周期短、预期不足的特点，这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益组织在战略规划、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稳定性和长期视角。“重项目、轻机构”的资助导向，设置的人员成本预算占比偏低（如不得高于 20-30%），使得许多组织疲于资金申请和项目执行，无暇顾及组织和人才发展。

再次，组织间协同与公益价值统一性的不足。由于环境问题成因宏大而复杂，需要公益组织多方力量协同才能发挥更明显的影响力。当前行业内的联合和议事机制明显不足，且由于资源有限且竞争激烈，许多机构缺乏开展共同行动的动力和精力。另一方面，行业支持中有技术层面的培训相对多，公益价值培训不足的情况。而资助决策中公益价值的不统一，可能对项目设计和质量造成影响。

2.7.3 2030 展望与建议

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引领下，公众环保意识普遍提升，这为环保组织发展，包括公众筹款、动员志愿者、进行公众倡导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有望降低信息和数据分析等专业工作的成本，善用智能技术将可以极大地提升环保公益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并降低成本。本报告建议：

一是构建更加稳健和多元的筹资体系。随着国际资金来源减少，未来的资金渠道将主要来自国内，特别是商业向善和企业 ESG 资金，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需求，这为推动筹资模式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化提供了可能性。行业将从依赖单一项目资助向更加多元和可持续的筹资模式转型。因此，公益组织应加强自身的专业筹款能力建设，积极探索与企业的深度战略合作，将 ESG 需求转化为具体的合作项目，并探索社会企业、公益服务收费等“自我造血”模式，增强机构的财务韧性。公益组织也要学会向企业、政府等多元资助方讲述短期绩效与长期价值结合的故事，向公益基金会等战略伙伴积极争取核心支持。

23 <https://mp.weixin.qq.com/s/ibH3tMejVK07l33SNjH9fw>

24 2017 年，为了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自然保护地建设中，23 家公益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目标是在 2030 年前，推动和支持民间力量帮助国家管理国土面积 1% 的公益保护地。<https://mp.weixin.qq.com/s/VyHMHWDiREExRFzfrAAeWQ>

二是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通过交流培训活动、小额项目支持等鼓励和培养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等环保热心人士的成长，支持环保自组织和社团成长，这对行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要促进环保的跨界交流，吸引更多具有商业、技术、法律等背景的专业人士以各种灵活身份加入环境公益事业。要加大对行业中青年人才的培养，设计贯穿职业生涯的人才发展计划，包括为初入行者提供技能培训，为中层管理者提供领导力训练，并为核心人才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和发展空间。

三是应鼓励组织间深化合作与共建。应当支持平台和平台型组织的发展，鼓励环保公益组织形成网络，并在网络中提供公共性的能力建设和咨询数据。行业应更加关注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沟通与协作机制，共同开展研究、倡导和行动，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新格局。通过着力支持有实力的组织或平台型网络，开发使用 AI 等数字化工具并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技术支持，从而全面提升行业的运作效率和影响力。

2.8 国际交流与合作

“十四五”期间，中国加大力度深化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截至 2024 年 8 月，中国已与 42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 52 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²⁵，聚焦领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价值链与绿色贸易、绿色产业及技术创新、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²⁶。

同时，随着中国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以及企业出海的需求越发强烈，气候及环境公益行业在国际交流对话、在地组织联动、多边机制协商等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空间。

2.8.1 发展现状

当前，中国环保公益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气候与可持续发展交流合作，正处于从被动响应、项目执行的起步阶段，向主动参与、议题引领的战略发展阶段迈进。已从早期的参访、听会演进为“主办活动、落地项目、构建网络”等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模式，并且有向驻外运营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形式上，我国环保公益组织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生物多样性大会、塑料公约大会、海洋大会等国际会议的机构、人数、深度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OP 大会上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已经十分活跃，从参会、听会到走出“中国角（China Pavilion）”举办研讨会、新闻发布、展示展览活动。例如万科公益基金会从 2013 年起与相关部委合作，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建设。特别是在 2021 年疫情期间，在 COP26 蓝区主办“中国企业家馆”，迈出了中国环保民间公益机构首次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办馆的先河。中国民促会与万科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联合支持中国中小社会组织参与气候变化 COP 大会，设立和组织“COP 同行”项目活动。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组织正通过获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观察员身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等方式加入全球环境治理大潮。

在国际交流方面，以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科莱美特（CYCAN）等机构

25 <https://www.ccchina.org.cn/Detail.aspx?newsId=74692&TId=93>

26 http://www.fecomee.org.cn/zcyj/202506/t20250625_1121904.html

为代表，通过组织代表团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FCCC COP）、生物多样性大会（CBD COP）等国际多边平台，或举办中欧民间组织对话会，为中国民间声音提供国际表达渠道，提升议题可见度。智库型公益组织（如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正逐渐从国际讨论的参与者，迈向更重要的知识经验提供者，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参与政策论坛等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政策方案。

在网络建设方面，如红树林基金会参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网络”，通过跨区域、跨议题的联盟建设，增强中国组织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与议程设置能力。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等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八个国家的 11 家 NGO 共同发起成立了“东亚和东南亚社区保护网络（EASEACCN）²⁷”，整合区域社会组织资源，实现经验共享，是目前由我国社会组织发起成立的最大网络交流平台之一。海南智渔与东南亚海洋和渔业可持续发展领域 NGO 伙伴组成“蓝色气候伙伴”交流平台，目前已经开展中国-东盟海洋保护青年人才培育项目。

与此同时，我国环保社会组织直接在境外资助或直接开展项目的案例已经开始出现。GEI 是最早在境外（东南亚、非洲等地）开展研究和落地项目的环保组织，在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推动社区清洁能源项目，输出中国在农村节能炉灶、沼气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与蚂蚁公益基金会等合作发起“蓝色伙伴关系行动”，已在东南亚地区 8 个国家开展 10 个海洋保护项目，间接惠及项目区域超 37 万沿海渔民、旅游从业者和当地居民²⁸。

这些模式的共同特点是：议题聚焦全球公共性（如气候、海洋、塑料、生物多样性），地域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尤以东南亚、南亚、非洲为主），合作形式以经验交流为主，强调经验转化为符合当地社会文化语境的案例学习。

但总体而言，有能力和意愿、将对外交流合作纳入机构战略的我国民间公益组织数量并不多，议题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渔业、塑料污染治理等全球性议题领域。多数以举办交流活动以及支持在地机构项目合作的形式开展，设立驻外分支机构的情况还很少。

2.8.2 主要挑战

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的进程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制约其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

首要挑战在于人力能力的系统性短板。除大型机构外，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大多缺乏熟悉国际交流模式、掌握语言沟通能力、具备跨文化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公益组织大多尚未将国际合作活动纳入长期发展规划，缺乏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识和重视。

其次是政策与管理制度模糊、不统一的障碍。尽管在宏观层面国家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但在地方和主管部门层面对社会组织境外活动的审批备案、资金跨境流动等方面的规定存在障碍和差异。导致公益机构在境外设立实体、长期派驻人员或开展项目时面临一定的风险与操作困难。

27 http://www.geichina.org/easaccn_launching/

28 https://mp.weixin.qq.com/s/CaKl_LzywjlxNwXp4tXy3A

第三是落后于企业需求。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矿业等领域，其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ESG）日益突出，亟需专业组织提供社区项目设计实施、环境评估、公共关系等服务。然而，当前多数中国环保公益组织尚不具备在地社区网络或对接能力，难以满足企业对即时响应以及专业化服务的需求。

最后，“走出去”的资金保障仍然十分脆弱。一些海外项目的资金依赖国际基金会的支持，来自国内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比较有限。国内公众对开展海外公益的支持度、捐赠意愿都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限制了资金的快速增长。在当前公益基金紧张的大背景下，国内筹资的不足是制约环保社会组织走出去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2.8.3 2030 展望与建议

展望 2030 年，全球气候治理将逐步呈现“减缓与适应并重”，为中国公益组织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气候脆弱地区推动气候变化适应型农业、渔业、韧性社区、城市规划等领域合作创造了交流合作空间。既能够有效回应当地需求，也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在政策、技术、管理方面的实用经验。

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速，投资建厂、矿产资源开发、跨境贸易等经济活动带来了当地国环境与社会风险挑战，企业对本土公益组织的专业支持与协同合作需求正急剧上升。公益组织必须从“边缘辅助者”转型为“战略协作者”，系统回应企业在海外运营中面临的 ESG 合规、社区关系管理、声誉风险控制、绿色标准对接等核心需求，方能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形象建设的双赢。

一是将“走出去”纳入机构长期发展规划。建议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加速从“活动导向”向“战略导向”转型，将“走出去”纳入机构长期发展规划，建立专门人员或部门，系统培养具备国际合作能力的复合型团队。

二是强化知识生产与经验沉淀。建立相关的交流网络和案例库，提升知识供给能力。为克服资源有限、经验不足、国际网络薄弱等现实困境，社会组织应当以区域或议题为纽带，构建常态化的国内合作网络与平台机制，通过定期举办工作坊、案例研讨会、实地互访等形式，有效整合力量，实现优势互补、经验互鉴。

三是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对基金会等资助方而言，亟需转变“重国内、轻国际”的资助逻辑，从战略高度明确支持公益组织“走出去”的领域和方式，包括设立专项对外发展基金，支持机构能力建设与长期项目运营，鼓励与国际基金会联合资助三方合作项目。在能力建设项目中将对外合作纳入关键领域，回应组织在人才储备、风险应对、网络搭建等能力建设的需求，并维持资金支持的长期性与弹性，允许组织在制度模糊时采取灵活方式、允许试错，从而真正培育出一批具备国际运营能力的先锋机构。

第3章 影响力示范项目计划

影响力示范项目旨在引领气候慈善领域资助方向，激发气候慈善伙伴的行动力，探索行动路径，项目运作模式，资金筹措方式，相关各方协调合作机制等，助力《规划 2030》顺利实施，实现气候领域慈善公益的集合影响力。

3.1 温室气体减排

• 内蒙古多场景近零碳实施项目

项目背景

内蒙古作为一个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费偏煤、能源效率偏低、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大区，年产煤量超过 10 亿吨，超过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火电发电装机容量接近 9000 万千瓦，不论是人均装机容量还是人均发电量均为全国第一。在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下，老牛基金会牵头打造的内蒙古近零排放示范项目，将结合内蒙古生态屏障和能源基地的功能定位，选取矿山、工厂、校园等多个场景，结合项目条件打造内蒙古近零排放示范工程项目，有序推进能源高效利用和碳减排。

项目目标

将打造 3-5 个示范项目，从科学减碳方案制定到落地实施，打造好样板间，验收完成后由项目颁发“近零排放示范基地”牌匾；为 100+ 企业 / 学校等场景提供科学减碳方案咨询，组织“双碳技术交流会”，持续 3 年，为全区科学减碳方案引入技术及资金；发布《全球 100 个碳中和场景案例集》，为全国双碳工作提供借鉴；10 万亩草地恢复及可持续放牧方案制定；推动 5000 名中学生参与大气循环、绿电循环、水循环等碳中和科普教育基地建设。

项目预算

在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下，老牛基金会等捐赠首期资金 300 万成立“碳中和慈善信托”，引入伊金霍洛旗减碳生态振兴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等社会资本，引入中华环保联合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等京津冀地区的科研力量，深圳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粤港澳大湾区的双碳技术力量。探索由政府搭台，社会组织捐资成立慈善信托，科研机构创新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合作模式。以“碳技术 + 碳金融”路线为内蒙古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贡献力量。

• 长江流域可再生能源应用及推广——零碳航运与能源公正转型计划

项目背景

旨在构建长江中游水岸协同的零碳示范区，引领航运清洁化、企业员工参与化、可再生

能源惠民化的公正转型，实现从商用到民用的生态保护与低碳发展深度融合。项目将多种已成熟的低碳技术系统性集成，并与数字化管理工具整合进行应用；通过公益金融手段促进传统行业转型；项目整体注重以模块化、标准化工具设计为主要思路，并且将生态保护与能源、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内容结合便于主流化。

项目目标

引领内河船舶清洁能源替代率突破 40%，碳排放强度较 2025 年下降 35%；建成智能化、可复制的长江流域低碳能源惠民网络，实现年减碳 10 万吨，覆盖 100 个村落 / 老旧社区的核心设备安装与智慧管理体系，直接惠及 10 万居民，并培育社区自主运维能力；推动长江流域至少 50 家企业参与企业自然低碳角，并影响其内不少于 30% 的员工。

项目预算

由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计划发起，周期为 5 年，总预算 1500-2000 万元。资金筹措方式为企业捐赠，国内外资助型基金会。

3.2 气候适应与公正转型

• 中国 - 东盟红树林保护修复合作项目

项目背景：

3-5 年内，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开展红树林修复工作，建立 3-5 个社区参与红树林保护的案例。通过组织赋能培训，国际行业交流、互访考察，应用无人机等科技技术，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能力，恢复红树林，保护社区生态安全，提高海岸带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项目目标：

恢复 50 公顷红树林，保护超过 10000 公顷红树林湿地；组织不少于 5 次国际培训和考察交流；与 3 个社区建立联系，建立社区共管的红树林保护模式；通过红树林固碳，预计每年减少碳排放 2000-2500 吨。

项目预算：

由红树林基金会（MCF）计划发起，项目周期 5 年，项目预算为 500-1000 万元；资金筹措方式包括：号召企业捐赠以及申报行业资助项目。

• 三北工程生态修复项目

项目背景

基于老牛基金会多年参与生态治理和植树造林的经验，以及“三北”防护林工程攻坚战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在内蒙古开展数万亩生态公益林营造工作。项目将生态公益林造林与固沙、社会化管理与社区参与、生态效益与生计联动，助力实现项目区域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目标。

项目目标

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三北”工程生态修复，营造数万亩生态公益林，在未来3年内助力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

项目预算

老牛基金会计划联合内蒙古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会、上海蚂蚁森林生态绿色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周期为3年，项目预算4000万元。

• 城市韧性家园项目

项目背景

作为气候变化适应城市与社区建设项目，本项目基于万科公益基金会气候韧性示范社区经验以及恒星计划等项目在培育基层环保组织方面的经验，旨在通过示范社区建设、分层能力培训、知识产品开发融资平台以及创新融资机制探索，推动基于生态系统韧性的城市社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

项目目标

1. 推动3-5个气候韧性示范社区，通过生物多样性提升降低极端气候事件对居民的影响，形成可复制的社区气候变化适应模式；

2. 培养基层气候行动骨干、赋能社区环保组织，将气候变化适应融入垃圾分类、堆肥等现有工作，构建可持续的本地化气候行动网络；

3. 通过《案例集》及研究报告，系统总结实践经验并提出政策建议，为全国社区气候治理提供民间解决方案参考；

4. 探索“社区-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多方协作创新融资机制，建立多边参与气候融资平台，推动气候变化适应成为城市基层行动落地。

5. 主要产出包括建成3-5个示范社区、培训10余个社区组织、辐射影响30+个居民小区、出版案例集和研究报告各一份，并设立一支城市气候韧性专项基金、一个城市气候韧性融资平台和一套气候韧性创新金融机制。

项目预算

万科公益基金会主要负责项目的执行，项目周期为3年，预算100万元。资金计划30%由基金会资助，40%来自社区共建气候专项资金，30%来自创新金融机制融资资金。

3.3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

•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的公众倡导

项目背景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协同在巴黎协定和昆蒙框架目标下都是重要的战

略性目标。完善的生态系统不仅能够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而且能够为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提供重要的战略性支撑。

但是该领域相关工作的开展，面临着行动主流化的问题，尤其是发挥重要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适应的重要功能，从认知到行动国内外都刚刚起步，需要重点考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多样性，进一步增强生态系统韧性和气候韧性的问题。需要从科学到公众科普，让学界、政界和公众了解生态系统、保护地在应对气候变化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推动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开展。

项目目标

- 推动中国的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地，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行动策略的提升和完善，推动学界、政界、公众理解气候变化适应型评估和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
- 开展一系列研究性的研讨，跨部门、跨领域开展自然保护领域的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
- 开展面向公众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的公众倡导活动
- 识别一些气候变化暴露度高的区域，开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气候变化适应型行动项目的落地，比如青海湖、三江源等重点区域。
- 结合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探索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保护策略和气候适应行动的试点示范。

项目预算

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发起，项目周期为3-5年，总预算500万元（以非公募的形式向潜在捐赠方和合作伙伴筹措）。属于保护地与自然遗产地项目。

• 蓝碳与生态系统碳汇机制创新、标准化体系建设与落地示范

项目背景

蓝碳包括滨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如红树林、海草床、盐沼湿地等。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但尚缺乏统一的计量监测体系与标准方法。与此同时，森林等陆地碳汇在国家、区域及企业碳中和目标中具有“压舱石”作用，但现有碳市场机制并不足以全面支撑控温目标。因此本项目战略性布局“从绿碳到蓝碳”，构建覆盖陆地与海洋的碳汇标准化体系；聚焦NBS（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投融资难题，探索气候投融资与生态保护的结合；通过示范试点形成可推广的抵消机制，发挥中国在碳汇领域的先行优势。

项目目标

1. 总结生态系统碳汇抵消机制的国际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的路径；
2. 在绿碳与蓝碳领域同步推进标准化与试点示范项目，形成创新的抵消机制；
3.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机制创新成果进入全球议程。

项目预算

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发起，周期为3-5年，总预算约1500万元（以非公募方式筹措）。该项目以“蓝碳标准化体系建设”与“生态系统碳汇抵消机制创新”两大方向为核心，旨在推动我国生态系统碳汇从监测、标准到抵消机制的全链条创新。

3.4 减污降碳协同

• 故宫零废弃

项目背景

故宫博物院与万科公益基金会合作的“故宫零废弃”项目于2020年1月启动，推动故宫博物院“零废弃办公”和“零废弃游览”。双方首期合作后，于2022年3月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备忘录，持续优化故宫博物院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基础设施，建立起对多元群体进行精准倡导的长效机制。项目采用了以人为本的精细化管理、文化融合的设施改造、废弃物管理模式升级、变废为“艺”的循环利用和融合生态与艺术的微景观打造等多重方法。截至2025年9月，项目触达了超过4万名导游和3000位故宫职工，并吸引了3.6亿次公众的线上参与，做到了“零废弃”议题的破圈；两院区处理园林绿化废弃物96.2吨，产出堆肥土壤改良剂37.6吨，相当于减少73.2吨二氧化碳当量。

项目目标

- 围绕“零废弃办公”和“零废弃游览”两大方向，对故宫博物院进行科学精细的废弃物管理，优化故宫生态风貌、打造“绿色故宫”；
-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将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国际领先的零废弃博物馆，为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创新方案；
- 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新思路，号召观众及社会公众关注并响应气候变化行动，促进遗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

项目预算：

年度预算100万元。

•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

项目背景

为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着力实现人海和谐、水清沙净的美丽愿景。自2017年以来，项目组织全国沿海城市志愿者捡拾海滩垃圾，并通过一系列海洋科普活动、特色海洋文化活动，将保护海洋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广泛传播到全社会。项目已经成为覆盖54个沿海城市、联动数千志愿者和70余家地方参与单位的年度行动。

项目目标

- 项目以公众参与影响力传播为核心，推动海岸清洁与海洋科普。
- 引导公众改善行为习惯，增强环保意识。
- 促进地方社会组织发展，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海洋公益。

项目预算

项目年度预算 200 万元左右，主要为中国海洋保护基金会自筹。预计未来 5 年每年覆盖中国沿海约 50 座城市，邀请和吸引 1 万名志愿者参与活动，预计清理岸线长度 2000 公里，海滩废弃物百余吨。

3.5 公众宣传

• 自然之友玲珑计划

项目背景

玲珑计划——公民气候行动计划由自然之友、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果壳自然联合发起，聚焦公民气候行动者在行动计划设计阶段和开展初期的核心需求与挑战，通过线上线下课程、导师陪伴辅导、社群共学和讨论、在线资源中心、资金 / 影响力和平台支持等一系列方式，支持卓越的公民气候行动者和领导者更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领域的真问题，同时影响更多绿色公民关注、参与和回应气候变化领域的问题和挑战。

项目目标

短期：寻找和支持有动力、有想法、有认知、有策略的潜在气候行动者和长期气候行动者。

中期：赋能与支持气候行动者，更有效地解决气候领域变化的真问题。

长期：行动模式和经验能够被复制、扩大、传播，为社会提供气候行动案例，推动自下而上的减缓与适应解决方案，补充政府与企业行动

项目预算

未来五年每年持续投入 120 万元，资金来源于持续支持玲珑计划的各家基金会和自然之友的公众筹款，预计能够再挖掘 150 余名各行业的种子伙伴在气候教育和科普传播、温室气体减排、社区 / 公众气候适应、气候政策倡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方向开展个体行动者的气候行动。

• 绿色空间使用者计划

项目背景

项目旨在推动更多“工厂、园区、商场、写字楼、学校、博物馆、医院、公园”等各类空间变成“活态绿色博物馆”，通过空间绿色化与绿色教育相结合，使公众尤其是青年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和旅游场景中自然接受生态环境教育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项目突出“空间即课堂”理念，将冷硬的建筑、工厂与园区转化为沉浸式教育载体，不额外占用受众时间。通过“运营者-组织者-使用者”三线并行机制，实现空间运营有标准可循、教育组织有场地可用、公众有体验可参与的三方共赢。采取“标准+案例+资助+赋能”四轮驱动策略，先打造案例，再建立标准，最后通过资助与赋能扩大示范效应，降低推广门槛。项目还分领域深入人居与工业场景，并借助国际平台如COP30、COP31发布成果，为全球提供实践借鉴。

项目目标

(一) 关键利益相关方引入与启动。联合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典型空间运营企业，目前已引入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万物云等单位，后续将拓展至工业领域代表。通过上海气候周等平台举办启动仪式，提升项目影响力。

(二) 绿色空间案例征集与推广。以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和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为基地，面向多类空间运营单位征集绿色实践案例，涵盖人居与工业空间。2025年9月和2026年11月分别开展两轮征集，对案例进行筛选、分析与推广，编制中英文《绿色空间使用者年鉴》，并在COP30、COP31等重要国际场合发布。

(三) 绿色空间管理标准开发与评选。建立专项工作组，联合标准化与传播机构，开发《绿色空间管理行动评价标准》。2026年4月前成立人居与工业空间标准工作组，10月前构建标准框架与合作伙伴机制。依据标准开展运营者评价与优秀评选，推动绿色空间规范化建设。

(四) 绿色教育与传播活动支持。筛选并支持20家绿色教育组织者或传播者，通过资金或能力赋能，助力其利用绿色空间开展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下半年至少举办100场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的活动，聚焦绿色消费、循环经济、低碳生活等主题。

(五) 项目宣传推广与影响力提升。与权威媒体及平台如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凤凰卫视、“零碳使命峰会”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合作，扩大项目声量，推广绿色生活与制造理念，提升公众绿色意识。

(六) 征集100个以上绿色空间案例并编制中英文年鉴；建立多类绿色空间管理标准体系；支持20家组织者开展100场教育活动；推动100家单位提供案例、200家参与评选；构建全国性宣传矩阵，显著提升全民绿色行动能力。

项目预算

由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发起，计划联合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万物云和威立雅（拟）共同推广的影响力传播和公众参与项目。项目周期为2年，预算300万元。

• 个人碳账本促进公众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项目背景

IPCC《2020排放差距报告》指出，家庭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规模化的行为和文化变化有望实现40%-70%的减排。加快转变公众生活方式已成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6%的能源消费直接用于居民生活，由此产生的碳

排放占比超过 30%，推动消费端减排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关键意义。

碳普惠机制作为面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创新机制，正向激励公众参与低碳生活，已被纳入国家多项政策，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CCER）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CEA）共同构成减排政策体系。然而，当前碳普惠发展仍面临数据孤岛、标准缺失、可持续性不足等挑战。

项目构建以“绿普惠云 - 碳减排数字账本”（简称：绿普惠云、个人碳账本）为核心的数字化平台。本方案旨在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社会参与、市场化运行”的可持续生态系统：以每一个“人”为核心，让每个人的绿色低碳行为都能被可记录、可衡量、有收益、被认同，最终使绿色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大众的自主选择。

本方案使用互联网、大数据、隐私计算等信息技术，在不触及用户隐私数据的前提下，实现公众绿色行为的多场景汇集，并研发大数据计算引擎，对行为数据建模，匹配相应标准 / 方法学算法，实现公众绿色低碳行为的量化计算和去重计算，从而获得个人在衣食住行用等生活过程的减排量，形成个人碳账本。依托大数据服务能力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鼓励个人减碳行动，可涵盖企业 ESG、绿色营销、绿色金融、碳中和活动等等，从而在生活和消费端建立起一条全新的减碳路径。

项目目标

以科技带动全民减排为使命，以“到 2060 年，绿色低碳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为愿景，通过建立全民减排标准体系，构建个人、企业、政府碳减排数字账本，为企业量化个人的碳减排行为，提供经营的绿色新路径，为政府提供全民减排量数字化工具，助力区域碳中和。

具体指标包括：为场景企业提供针对用户行为的登记量化服务，形成用户个人碳账本，预计年新增 1 家场景企业客户；协助 1-2 个地方气候主管部门建立碳普惠平台；协助地方落地 1-2 次面向公众的碳普惠倡导活动；记录超过 1.3 亿人的减排行为，减排次数超过 50 亿次，减排量超过 250 万吨。

自 2022 年 7 月项目启动以来，已取得显著成效：累计覆盖 1.16 亿人，记录减排行为超 43 亿次，产生减排量超过 212 万吨。服务饿了么、百度地图、美团单车、滴滴、滴滴青桔、哈尔滨城市交通、合肥市轨道交通、亿通行、安利、北汽极狐、麦德龙等四十多家场景企业。

项目预算

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业委员会发起此项目。未来三年每年持续投入 1000 万元，资金来源包括政府、企业购买服务以及相关行业资助项目。

3.6 绿色企业推动

• 产业转型加速器计划

项目背景

“产业转型加速器计划”重点关注铝、汽车、水泥、钢铁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碳中和目标非常关键的行业，聚焦这些行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标准、技术、政策、能力、产业链协作，以及资金缺口问题，通过公益的方法去支持标准及技术指南开发，关键企业及人才赋能，产业协同及资源对接，试点及政策倡导。项目在本阶段，重点关注水泥与混凝土行业在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区域性减排合作，致力于通过技术交流、市场培育和政策协同，共同打造可复制的亚洲方案；同时，项目深入铝行业的全价值链，致力于破解再生铝在高价值领域应用不足、低碳铝市场溢价与标准体系缺失等核心痛点，特别是在汽车等下游产业中推动协作模式创新。

项目将识别了当前产业脱碳面临的共性难题，如新技术成本高、商业化场景有限、低碳溢价分配不明、再生料应用标准缺失等，并围绕这些“痛点”设计了具体的研究与行动，项目将构建一套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如溢价评估、标准数据库开发、协作式研究等。项目旨在总结和提炼成功经验，构建一套可推广的“产业转型加速器”方法论，为更多企业提供看得见、学得来的实践参考，起到“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

项目目标

- (1) 探索再生铝溢价评估与分配机制，制定低碳铝产品相关标准，开发再生铝上下游协作模式、区域协作模式，设计车用再生铝全产业链的综合解决方案。
- (2) 研究水泥企业净零转型方案，形成水泥企业 CCUS 技术应用案例，举办亚洲区域水泥产业链合作交流会及行业低碳发展国际论坛。

项目预算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计划发起“产业转型加速器计划”，项目年预算 600 万元，由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资助。

3.7 行业基础建设

• 环境公益“新”力量——智慧生态共建计划

项目背景

当前，虽然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数量已经从 2006 年的 2700 余家快速发展到当前的 8000 家以上，但支撑行业发展的资金、人力、技术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尤其在数字化能力方面，整个环境公益行业都还十分薄弱，远远未能实现对于 AI 和数字化工具的充分调用，导致行业效率难以快速提升、先进的知识和经验未能充分共享，直接影响了环保领域理念传播、社群构建、政策协商等一系列相关工作高效开展。针对上述背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中华环保联合会，基于环境公益“新”力量培育项目两年的工作经验，拟发起“行业智慧生态共建计划”，与各地枢纽组织、新生环保机构共同探索环境公益行业数字化的可能性，提升数字化能力和整体效率，为行业快速发展注入“新力量”。

项目目标

- 1、预计未来每年能够支持 1~3 家枢纽组织开展区域和议题数字化试点，20 家以上基层

环保组织探索数字化技术与业务的结合，每年引入不少于 100 家环保组织加入数字化跨机构协同社群。

2、建立数字化社群基础架构和协同机制，并结合 AI 建立领域内重要资讯的共享策略。

项目预算

项目拟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资助，中华环保联合会和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联合实施的行业数字化项目，预计每年预算 150 万元，同时欢迎关注环境公益行业建设的机构参与共建。

3.8 国际合作

• 气候治理英才计划

项目背景：

本项目旨在通过能力建设、资助支持和专家辅导，培养一批能够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具备国际传播与政策转译能力的社会组织人才。项目以气候领域的社会组织为核心支持对象，推动其在 UNFCCC 等多边机制中提升表达力与影响力，形成代表性案例和成果，逐步增强中国社会组织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整体话语权和合作能力。

项目以培养气候领域国际化人才、支持有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潜力的社会组织为核心，推动机构成长与机构个人能力提升相结合，形成可持续的人才梯队。重点在于填补中国社会组织在国际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中的若干不足：目前参会仍较为碎片化，很多机构只是到会，缺乏持续机制与共识产出；基层声音进不去，草根、女性、青年代表往往因旅费、语言 / 议程门槛而难以在 UNFCCC 关键议题（如 GGA/ACE/JTWP/L&D）的正式议程里发声；证据链断裂：本土项目有成效，但缺统一指标与双语转译，难以进入政策文本或被引用；同时，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民间社区级气候变化适应经验交流仍显不足，跨境协作缺小额灵活资金支持。

项目目标

(1) 项目通过赋能支持（种子基金 + 专家陪伴），每年支持 3-5 家机构设计并实施小型气候行动项目，五年累计 15-25 家。重点领域包括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如水资源管理、健康与气候风险、生计与减贫、生态与文化遗产保护）、损失与损害（社区应对案例、事件记录与非经济损失文档化）、公正转型（能源转型中的社区与工人支持）、气候行动赋权（青年和女性的谈判训练与首次发声支持）。每家机构开展的创新项目须形成 1 份双语案例材料（累计约 15-25 份），并体现机构赋能和能力提升的成果，用于 UNFCCC 相关议题的政策交流与传播。

(2) 每年举办 2 场能力建设训练营，五年累计 10 场。五年内为不少于 15 家社会组织骨干人才提供赋能机会。除专题培训外，还为入选伙伴提供定制化的学习与实践机会，包括赴国内外顶尖机构和高校的访学交流，以及参与国际国内重要气候会议的名额。课程与活动内容涵盖战略领导力、气候科学前沿、政策分析与转译、跨界合作等，帮助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在知识体系、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上得到全面赋能。

(3) 知识产品与传播方面，项目将发布年度中英双语政策简报（累计 5 份），转译并推广国内外代表性实践案例；项目终期发布 1 份综合性成果报告《民间社会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力报告》。

(4) 国际会议与集体发声方面，五年内在 COP 及其他国际会议上组织或联合组织不少于 5 场边会或发布会。培养的社会组织代表在国际场域获得发声和展示机会，形成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成果。

项目预算

项目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CANGO）联手民间气候行动网络（CCAN）实施，周期为 5 年（2026-2030 年），预算为每年 300 万元。资金来自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 CEGA 成员、邀请高净值人群联合投入，或对接企业 CSR/ESG 项目。

结语

《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不仅是中国气候慈善力量的首次集体宣言与行动纲领，更是CEGA及气候慈善伙伴们聚力深耕气候领域、推动行业创新发展的坚定承诺。

这份规划是气候民间公益响应国家“双碳”目标的冲锋号，旨在更有效地衔接政府和企业的多元力量，更有力地共建一个高效而更具战略性的气候慈善生态。我们期待，在国家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关键时间节点，本规划能为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坚实的民间力量，并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生动故事。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我们鼓励所有气候慈善伙伴，以本规划为蓝图，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集合影响力，将共识转化为力量，将蓝图化为现实。

我们坚信，通过慈善的战略引导*、伙伴的精诚协作，我们定能汇聚起一股磅礴的绿色暖流，加速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开启 2030 气候慈善的新篇章，共同奔赴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更多资源请参考以下信息：

- (1) 《气候慈善伙伴行动规划 2030》 (http://cega.org.cn/data/file/2025/10/27/44026_xdpz_2714.pdf)
- (2) 《CEGA 气候慈善影响力案例精选》 (http://cega.org.cn/data/file/2024/11/20/22191_zi6d_1446.pdf)

附录一：报告评阅专家名单

2025年9月22日评阅会专家：

1. 孙桢 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原一级巡视员
2. 傅昌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3. 谢玉红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4. 刘家顺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5. 姚瑶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6. 杨彪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
7. 王利民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8. 王香奕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9. 贾如婴 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10. 张志明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政策研究室主任
11. 程憬怡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项目经理
12. 郑静茹 老牛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
13. 刘熙 万科公益基金会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高级经理
14. 郭送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合作经理
15. 徐小芳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
16. 吴言 红树林基金会（MCF）合作发展部总监
17. 叶谋鑫 红树林基金会（MCF）项目经理
18. 刘一峰 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19. 李大君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行业支持项目总监
20. 刘春蕾 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21. 毛达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理事长兼战略总监
22. 方应君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总干事
23. 白韫雯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24. 马军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蔚蓝地图创始人
25. 阮清鸳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蔚蓝地图技术总监
26. 汪子卓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专家
27. 翟宇博 能链集团企业ESG专家
28. 彭奎 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科学总监
29. 叶菲 儿童投资基金传播和战略合作经理

书面评阅专家：

1. 王谋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府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
2. 王振刚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
3. 王勇 公益时报副总编
4. 张立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

附录二：受访专家名单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1. 安亚强 老牛基金会秘书长
2. 白韫雯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3. 陈志强 粤港澳大湾区自然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4. 程明远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
5. 方应君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总干事
6. 何 方 青海省青海湖生态保护基金会秘书长
7. 何 苗 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品牌传播总监
8. 侯远青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秘书长
9. 黄莹欣 千禾社区基金会原项目官员
10. 贾如婴 北京绿阳光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11. 李大君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行业发展总监
12. 刘春蕾 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13. 刘 熙 万科公益基金会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高级经理
14. 马 军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蔚蓝地图创始人
15. 毛 达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理事长、“无毒先锋”发起人
16. 倪 垣 中华环保联合会战略部部长
17. 彭 奎 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科学总监
18. 阮清鸳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蔚蓝地图技术总监
19. 王 谋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府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
20. 王利民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21. 王文华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
22. 王香奕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23. 王奕庆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
24. 汪子阜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与 ESG 负责人
25. 伍靖枫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绿色供应链高级项目官员
26. 谢 达 湖北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项目经理
27. 谢晓慧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28. 杨 彪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
29. 杨培丹 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主任
30. 姚 瑶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31. 闫保华 红树林基金会（MCF）秘书长
32. 晏路辉 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33. 张 立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
34. 翟宇博 能链集团企业 ESG 专家

附录三：参与气候慈善伙伴招募及调研的机构名单 (按机构拼音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1. 北京创扶公益基金会
2.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3. 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
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5.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
6.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7.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8. 北京慈福公益基金会
9. 重庆市江津区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
10. 丹阳云阳街道至诚公益服务中心
11.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12. 佛山市顺德区慈善会
13. 甘肃省西峰农业气象试验站
14. 广东省低碳企业协会
15.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16. 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17. 湖州新能源云碳中和研究院
18.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
19. 湖北省湿地保护基金会
20. 湖南省创意环境科技传播中心
21. 昆明环保科普协会
22. 陇南市绿源环保志愿者协会
23. 马达涛志愿团队
24. 蚂蚁森林基金会
25. 老牛基金会
26. pta 植物联盟
27. 青海湖生态保护基金会
28. 青岛西海岸新区滨海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29. 清远市南瓜田自然教育发展中心
30. 三明市沙县区山水环保服务中心
31. 商道咨询
32. 上海金司南金融研究院
33. 上海长三角人类生态科技发展中心
34. 上海莱巍爵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5. 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36. 深圳市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37. 红树林基金会 (MCF)
38. 深圳市湖石海洋科技研究院
39. 深圳市小鸭嘎嘎公益文化促进中心
40. 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
41. 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
42. 苏高新碳中和国际研究院
43.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44. 天津市滨海新区经开区龙猫社区营创服务中心
45. 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46. 万科公益基金会
47. 无锡市太湖碳普惠绿色发展中心
48. 西安空气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9. 西安市新城区春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0. 星竞威武集团
51. 延安市九五青年公益协会
52. 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
53. 中华环保联合会
54.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55.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56.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57.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58. 中国天气碳中和研究中心

附录四：机构介绍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接受生态环境部和民政部业务指导及监督管理，由热心环保事业的人士、企业、事业单位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

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宗旨是围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围绕实现国家环境与发展的目标，围绕维护公众和社会环境权益，充分体现中华环保联合会“大中华、大环境、大联合”的组织优势，发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中国环境事业发展，推动全人类环境事业的进步。

中华环保联合会主要职能是团结、凝聚各社团组织以及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和关爱环保工作，加强环境监督，维护公众和社会环境权益，协助和配合政府实现国家环境目标、任务，促进中国环境事业发展；确立中国环保社团应有的国际地位，参加双边、多边与环境相关的国际民间交流与合作，维护我国良好的环境国际形象，推动全人类环境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

CEGA (China Environmental Grantmakers Alliance) 环境资助者网络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启动，是中国环境资助者交流合作的平台。宗旨是运用战略慈善理念，促进环境领域资助者的合作与发展，引领未来环境领域的资助方向，实现环境领域慈善资金社会效益最大化；文化理念为：融合，共建，共享，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CEGA 不是独立的法人注册机构，是环境资助者合作项目。2018 年至 2024 年 3 月依托基金会中心网运行，2024 年 4 月起，本项目依托中华环保联合会运行并在 CEGA 决策委员会指导下工作。目前决策委员会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MCF）、老牛基金会、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及中华环保联合会组成。CEGA 决策委员会每届三年，决策委员会主席由决策委员会选举产生。历任主席包括老牛基金会理事长雷永胜、原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原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及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亚强。现任联席主席为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谢晓慧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姚瑶。其它成员伙伴包括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自然之友基金会、北京绿化基金会、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青海省青海湖生态保护基金会、湖北省湿地保护基金会、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及战略合作伙伴能源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简称：SEE 基金会）成立于 2008 年，为 5A 级公募基金会。SEE 基金会以环保公益行业发展为基石，聚焦荒漠化防治、气候变化与商业可持续、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海洋保护四个领域。发展至今，已联合超过 1200 家中国民间环保公益机构或个人开展环境保护公益行动，累计影响和带动了近 11 亿人次公众成为环保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未来将进一步带动和整合企业家及社会资源投入，号召公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化保护平台价值，共同守护碧水蓝天。





- 环 境 资 助 者 网 络 -
CHINA ENVIRONMENTAL GRANTMAKERS ALLIANCE

环境资助者网络 (CEGA)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14区青年沟东路华表大厦六层

电话：010-51266665

邮箱：zhangruiying@acef.com.cn



版权所有 © CEGA